臺大歷史學報第 51 期
2013 年 6 月，頁 119-180

BIBLID1012-8514(2013)51p.119-180
2013.1.15 收稿，2013.2.25 通過刊登
DOI: 10.6253/ntuhistory.2013.51.03

吉朋的史學與近代歐洲的古典學術

楊 肅 献 *

提 要

本文探討 18 世紀英國歷史家吉朋（Edward Gibbon, 1737-1794）的羅馬史寫作與近代早期歐洲古典學術之間的關連。吉朋一生學術盡在《羅馬帝國衰亡史》（*The History of the Decline and Fall of the Roman Empire*）一書，這一部六卷的鉅著處理了兩個羅馬帝國將近 1300 年的衰亡史事，書寫耗費吉朋近二十年的光陰，乃是其畢生最重要的志業。這部巨構是在什麼樣的學術基礎上完成的？這是一個值得探討的學術課題。

吉朋是一個鄉紳子弟，自幼接受文法學校的古典教育；青少年時期，他遠赴瑞士洛桑求學，獲得進一步的古典學術訓練。在這時期，吉朋接觸了近代法國的古典學術，並廣泛閱讀文藝復興以來歐洲古典學界的著作，從古典考訂到古物研究各種類別。在這過程中，他累積了大量有關古代羅馬歷史的材料，成為爾後書寫《羅馬帝國衰亡史》的學術基礎。吉朋雖然自身終究沒有成為一個專業的古典學者，卻瞭解古典學者研究工作的史學價值，知道如何去運用這些研究發現來照亮古代的歷史。他在《羅馬帝國衰亡史》的寫作中，巧妙地結合了近代歐洲的古典學術與 18 世紀的啟蒙精神，完成了自從古典時代結束後歐洲史學上最重要的巨構。

臺灣大學學術期刊資料庫

關鍵詞：吉朋　《羅馬帝國衰亡史》　古典學術　古典研究　古物研究

* 國立臺灣大學歷史學系教授
10617 臺北市大安區羅斯福路 4 段 1 號；E-mail: yangsh@ntu.edu.tw.

導言：《羅馬帝國衰亡史》的學術基礎
一、近代早期歐洲古典學術的發展
二、吉朋與古典學術的相遇
三、吉朋與古典研究傳統
四、吉朋與古物研究運動
五、結語

導言：《羅馬帝國衰亡史》的學術基礎

18 世紀英國歷史家吉朋（Edward Gibbon, 1737-1794）一生的學術，盡在《羅馬帝國衰亡史》（*The History of the Decline and Fall of the Roman Empire*，以下簡稱《衰亡史》）一書。這部鉅著全書共 6 大冊 71 章，敘述西、東兩個羅馬帝國近 1,300 年的衰亡史事，書寫此書耗費了吉朋近二十年的光陰，乃是其畢生的志業。從任何角度看，《衰亡史》都是一部傑作，堪稱歐洲史學自古典時代結束以來最著名的史著。這一部史學巨構是如何構造的？特別是，吉朋是在什麼樣的學術基礎上完成這樣的巨構？這是吉朋的讀者或研究者感到興趣的課題。

就如羅馬不是一天造成的，《衰亡史》一書也絕非輕易就可寫成。認識吉朋的學術者都會同意吉朋的閱讀廣闊、治學堅實，而這些特點都明顯地反映在《衰亡史》裡面。他敘述羅馬帝國衰亡的歷史時，旁徵博引的功夫非常驚人。根據統計，這部書全書共下有 7,917 個註腳，內容主要是在註明本文敘述的資料出處，或說明資料取捨之類問題。這近 8,000 個註腳有如 8,000 塊堅實的磚塊，在吉朋手中疊出一座不朽的「羅馬帝國」大廈。[1]

臺灣大學學術期刊資料庫

1 這個數字是根據 1905 年英國 Methuen 出版公司發行的 Methuen Standard Library 版七卷本 *The History of the Decline and Fall of the Roman Empire* 的統計而得。

那麼，這將近 8,000 塊的歷史「磚塊」是如何取得的？無疑的，是來自吉朋畢生孜孜的勤學與驚人的閱讀。他曾在《自傳》（*Memoirs of My Life and Writings*）中回顧《衰亡史》的寫作：「我的敘述是萃取自我最後一個時期的古典閱讀。」[2]這裡所說「最後一個時期的古典閱讀」，指的應是 1768 年以後吉朋在羅馬史計畫「從願望到期待，從期待到規劃，從規劃到執行」後，進行的系統性閱讀。在這過程中，吉朋從塔西陀（Publius Cornelius Tacitus, c. 56-117）、小普林尼（Pliny the Younger, c. 61-113）和朱文諾（Decimus Junius Juvenalis，活躍在西元 2 世紀初）等「熟悉的舊伴侶」讀起，並「不知不覺地潛入奧古斯都時代浩瀚的歷史大洋之中」。他在閱讀時：

> 總是一筆在手，逐步往下探究，深入希臘文與拉丁文的原始紀錄，從笛歐（Dio Cassius, c. 150-235）到阿米亞努斯（Ammianus Marcellinus, c. 330-395）的著作，由圖拉真（Trajan, 98-117 在位）時代直至西羅馬皇帝末期為止。紋章、銘刻、年表等輔助資料被安置到應到的課題中。同時，我運用提勒蒙（Louis-Sébastien Le Nain de Tillemont, 1637- 1698）的彙編……來編排……這一批零碎鬆散的歷史材料。我在博學的穆拉多利（Lodovico Muratori, 1672-1750）的義大利《編年》（*Annali d'Italia*）與《古史》（*Antiquitates Italicae medii Aevi*）裡，於漆黑的中世紀探索我的路；努力將其與西格尼烏斯（Carlo Sigonius, c. 1524-1584）與馬費（Scipione Maffei, 1675-1755）、巴隆尼烏斯（Caesar Baronius, 1538-1607）與巴吉（Antoine Pagi, 1624-1699）等著作中相平行或交叉的文字，對照參證，直到幾乎觸及 14 世紀羅馬的廢墟為止。[3]

這段自敘吐露了吉朋羅馬史書寫的學術根基。歸納地說，他的寫作主要依靠兩類資料：一、羅馬時代的拉丁典籍，如塔西陀、小普林尼、朱文

2 Edward Gibbon, *Autobiography of Edward Gibbon as Originally Edited by Lord Sheffield* (Oxford: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1907), p. 180. 中譯文為筆者自譯，下同。

3 Edward Gibbon, *Autobiography*, pp. 171-172.

臺灣大學圖書館 期刊資料庫

諾、笛歐、阿米亞努斯之屬的著作；二，近世歐洲古典學者的論著，包括義大利的巴隆尼烏斯（天主教史家）、西格尼烏斯（古史家）、穆拉多利（義大利中古史家）、馬費（古史家）與法國的巴吉（教會史家）與提勒蒙（羅馬史與教會史家）等的著作，以及紋章、銘刻與年表等方面的古物研究資料。

吉朋的《衰亡史》寫作學術基礎之廣博，可從書中 7,917 個註腳的內容獲得印證。吉朋使用註腳之多與應用之妙，可說是前無古人、來者難及。學者馬欽（I. W. J. Machin）統計，在《衰亡史》近 8,000 個註腳中，有 4,413 個是引證近代早期歐洲古典學者的著作或編纂作品。[4]換言之，吉朋寫作時引用的資料有一小半取自古典拉丁作家的著作，另一大半則是依賴近代歐洲古典學者的研究。這個統計點出吉朋史學與近代早期歐洲古典學術的密切關係。

根據馬欽的研究，《衰亡史》引證的近代古典學者人數多達 409 人，涵蓋英國、法國、日耳曼、義大利等地區，[5]囊括了 16 到 18 世紀歐洲絕大部分古典學術權威，幾乎也是一個 18 世紀史家所能掌握的羅馬史研究資料的最大能耐了。[6]這一批歐洲的古典學者，一部分來自文藝復興的「古典研究」學術，另一部分則出自 17 世紀以降的「古物研究」（antiquarianism）傳統。這兩類學問構成近代早期歐洲「古典學術」（classical scholarship）的主要內容。

吉朋的《衰亡史》寫作融合了近代早期的古典學術與 18 世紀的啟蒙精神，細心的讀者可在這部巨構中看到吉朋對古今學術所作的巧妙結合。本文的目的，即是要探討吉朋的羅馬史寫作與近代早期歐洲古典學術之間的關連。

---

4 I. Machin, “Gibbon’s Debt to Contemporary Scholarship,” *Review of English Studies* 15 (1939, Reading), pp. 85-86.

5 I. Machin, “Gibbon’s Debt to Contemporary Scholarship,” *Review of English Studies* 15, p. 85.

6 David P. Jordan, *Edward Gibbon and His Roman Empire* (Urbana: University of Illinois Press, 1971), p. 41.

臺灣大學學術期刊資料庫

一、近代早期歐洲古典學術的發展

（一）文藝復興運動與古典學術的興起

吉朋的羅馬史書寫在很大程度上是仰賴近代早期歐洲古典學界累積的研究成果。欲探討吉朋與歐洲古典學術傳統的關連，首先必須對近代歐洲「古典學術」的發展史有所瞭解。

英國古典學者山迪斯（Sir John E. Sandys, 1844-1922）在 20 世紀初寫了一部百科全書式的《古典學術史》，指出文藝復興「古典學術」的主要目的是透過古代典籍的研究「摹仿和重製古典的風格與生活的模型」。[7] 1946 年，另一英國古典學教授葛洛（H. W. Garrod, 1878-1960）在劍橋大學「葛雷紀念講座」（J. H. Gray Lectures）演講「古典學」（Scholarship）之意義與價值時說：

> 古典學……可公平地視為是文藝復興時代的發明。與前輩們相較，文藝復興的學人是更真實的學者。他們設法復原一個業已逝去的生活。其學術工作是……從早已逝去的文學或語言的斷簡殘篇，還原古代的外觀和精神。[8]

誠如史家諾瑞特（Charles G. Nauret, Jr.）所說，文藝復興人文學者致力從古代典籍中「重新去發現、復活古羅馬文明的內在精神」，期望「在一個業已失去、然可回復之古代的基礎上，創造一個嶄新的文化」。[9]

從古代典籍的「斷簡殘篇」中尋回「羅馬文明的內在精神」，乃是義大利人文學者的特殊關懷。葛洛與諾瑞特都是從此一經典角度來定義

---

7 John E. Sandys, *A History of Classical Scholarship* (New York: Hafner Publishing Co., 1964), vol. 2, p. 1.

8 H. W. Garrod, *Scholarship: Its Meaning and Value* (Cambridge: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1946), pp. 19-20.

9 Charles G. Nauret, Jr., *Humanism and the Culture of Renaissance Europe* (Cambridge: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1995), p. 22.

臺灣大學學術期刊資料庫

古典學術的內涵。但是，隨著文藝復興的北傳，人文運動的探討領域也發生變化，古典研究的對象漸從「文學或語言」擴大為對「整個古典文明」的探討。20 世紀前期德國古典學者維拉莫維茲（U. von Wilamowitz-Moellendorff, 1848-1931）即從這個角度來討論古典學術。他在 1920 年代出版的《古典學術史》（*Geschichte der Philologie*）寫道：「古典學術的性質……是由其研究主題來界定：希臘—羅馬文明的精髓及其存在的每一方面。」他解釋說：

> 這個學科的工作，就是藉科學的力量來復活那個已經消逝的世界——重新復原詩人的歌詞、哲學家與立法者的思想、神廟的神聖、信仰者與非信仰者的情感、市場與港口的熱鬧生活、海洋與陸地的樣貌，以及工作與休閒中的人們。[10]

為了全面瞭解古典文明，近代古典學術依研究對象發展了一些獨立學科，如語言、文學、考古學、古代史、銘文學、泉幣學與紙草學等。不過，維拉莫維茲提醒，古典學術有整體性：「吾人致力探索的生活是一體的，故吾人的科學也是一體的。」研究古典時，學者須注意「莫讓這種獨立的東西窒息了整體意識」。[11]

近代歐洲的「古典學術」經歷幾個階段的發展。第一個階段是由 14 中期至 16 世紀中期，文藝復興中心是在義大利，人文學者出於「對古典語文的特別尊崇」，汲汲於「古典作品」的發現與考訂。第二個階段從 16 世紀後期持續到 18 世紀初，法國與荷蘭繼起為人文運動的重心，古典學術則主要轉入「古物研究」領域。[12]

（二）「古典研究」的發展

14 世紀中葉以降，隨著文藝復興運動的開展，「古典研究」成為歐

臺灣大學學術期刊資料庫

10 U. von Wilamowitz-Moellendorff, *History of Classical Scholarship*, translated with an Introduction and Notes by Hugh Lloyd-Jones (London: Gerald Duckworth & Co., 1982), p. 1.

11 U. von Wilamowitz-Moellendorff, *History of Classical Scholarship*, p. 1.

12 關此一分期，參見 John E. Sandys, *A History of Classical Scholarship*, vol. 2, p. 1.

洲人文學者的主要志業。這個文化運動的首要工作是「獵書」，亦即蒐集古籍的抄本，而佩托拉克（Francesco Petrarch, 1304-1374）是首開獵書風氣的學者。1333 年，這位詩人兼學者抵達低地國，在列日（Liege）圖書館內塵封的古籍中，找到兩篇羅馬作家西塞羅（Marcus Tullius Cicero, 106-43 B.C.）失傳已久的演說詞，「初嚐到發現的喜悅」；[13] 1345 年，他又在義大利的凡戎納（Verona）發現幾篇西塞羅的幾卷書信，即〈致阿題庫斯書〉（“Epistulae ad Atticum”）、〈致吾弟昆圖斯書〉（“ad Quintum fratrem”）與〈致布魯圖斯書〉（“ad Brutum”），並親筆抄錄下來。[14]佩托拉克的發現啟動了義大利的文藝復興，也帶動了近世歐洲的古典學術運動。

佩托拉克之後，義大利人文學者繼踵而起，競以蒐求古籍抄本為志。[15]他們風塵僕僕，造訪大小修道院，翻遍各地圖書館，以尋找古籍抄本；一旦有所發現，則能買的買，不能買的就自己抄錄或出資僱人抄寫。[16]他們的成果豐碩。14 世紀以前，許多古典作者或久已湮沒無聞，或鮮有知之者；然經過人文學者的努力，到文藝復興結束時現行希臘文與拉丁文的典籍都已大致齊備了。[17]

---

13 John E. Sandys, *A History of Classical Scholarship*, vol. 2, p. 7. 其中一篇是著名的 “Pro Archaia”（〈為詩人亞開雅辯護〉）。

14 關於佩托拉克的獵書工作，參見 John E. Sandys, *A History of Classical Scholarship*, vol. 2, pp. 6-9; Rudolf Pfeiffer, *History of Classical Scholarship from 1300 to 1850* (Oxford: Clarendon Press, 1976), pp. 9-10, 13-14.

15 佛羅倫斯的人文學者沙儒塔提（Caluccio Salutati, 1331-1406）、尼可羅（Niccolo Niccoli, 1363-1437）、柏吉歐（Poggio Bracciolini, 1380-1459）等致力於蒐求拉丁古籍，而瓜利諾（Guarino of Verona, 1374-1460）、奧瑞斯巴（Aurispa of Sicily）與費列爾佛（Francesco Filelfo, 1398-1481）等則進而蒐集希臘古籍。參見 Charles G. Nauret, Jr., *Humanism and the Culture of Renaissance Europe*, pp. 34-36.

16 王任光，《文藝復興時代的人文運動》（臺北：臺灣商務印書館，1968），頁 49-53。

17 包括希臘作家柏拉圖（Plato, 427-347 B.C.）、艾斯其勒斯（Aeschylus, 525-576 B.C.）、索福克里斯（Sophocles, c. 496-406/5 B.C.）、亞里斯多芬（Aristophanes, c. 445-c. 385 B.C.）、希羅多德（Herodotus, c. 490-c. 425 B.C.）、修昔底德（Thucydides, c. 460-c. 399 B.C.）與波力比烏斯（Polybius, c. 200-c. 118 B.C.）等，拉丁作家陸克雷修斯（Lucretius,

臺灣大學學術期刊資料庫

人文學者發掘古代典籍，目的是要從古籍中窺探古人的生活與理想，作為現世生活的指引。但古代典籍經歷傳抄，抄本多有訛誤，其中繕寫錯誤者有之，漏字漏句者有之，後人評註混入正文者有之，造成後人解讀上的困難。於是，人文學者又有必要對古籍進行校勘與考訂工作，以回復古籍原貌。他們常以不同抄本仔細比對、改正錯字、辨別真偽，以求得一個善本。[18]佩托拉克不僅搜求、傳抄古籍，而且一旦覺得文本有訛誤時，也會嘗試進行考訂。他的工作引導爾後人文學者走向「文本考訂」（textual criticism）之路，開啟歐洲古典研究之門。[19]

不過，佩托拉克在性情上是個詩人多於是個學者，其古籍考訂工作大都是隨興所至，且多屬臆測的性質，並非有系統的專業學術工作。他的考訂方法也相當單純，或以多種手稿進行校勘，或藉對古典的熟悉而生的直覺來作考訂，尚不是一種嚴謹的科學考證。[20]實質上，如維拉莫維茲所說，文藝復興早期人文學者的目的是「復活羅馬詩歌與修辭之美，和獵取那遭到遺忘的、可據以涵養新羅馬精神的羅馬典籍」，並不關注「史學或學術在蒐求或散播古籍上可扮演什麼角色」。總之，這些學者基本上「只是文人、政論家、教師，但絕未成為學者」，古典學術史一般而言也僅視他們為古代作品的發現者與散播者，並不「期待人文主義者的學術」。[21]

文藝復興運動雖始於 14 世紀中葉，但要到 15 世紀前期「古典學術」運動才真正展開。[22]義大利學者羅倫佐·瓦拉（Lorenzo Valla, 1407-1457）是這個運動的靈魂人物，其著作「標誌了文本考訂再度被引進的決定性

---

c. 99-55 B.C.）、李維（Titus Livius, 59 B.C.-A.D. 17）、塔西陀與昆提里安（Quintilian, c. 35-?）等，在中世紀時幾乎都遭到遺忘，見 Charles G. Nauret, Jr., *Humanism and the Culture of Renaissance Europe*, p. 36.

18 王任光，《文藝復興時代的人文運動》，頁 53-54。

19 Rudolf Pfeiffer, *History of Classical Scholarship from 1300 to 1850*, pp. 20-23.

20 Charles G. Nauret, Jr., *Humanism and the Culture of Renaissance Europe*, p. 37.

21 U. von Wilamowitz-Moellendorff, *History of Classical Scholarship*, pp. 20-23.

22 H. W. Garrod, *Scholarship: Its Meaning and Value*, p. 21.

臺灣大學學術期刊資料庫

階段」。[23]瓦拉是一個拉丁文「文法」專家與「修辭」大師，他將這兩種學問運用在古籍的考訂上面，發展出一套「語言學」（philology）的考證方法，帶來治學方法上的重要突破。1440 年代，他以這種方法考證羅馬教廷的重要文獻《君士坦丁的捐獻》（*Donatio Constantini*），發現此一文獻乃是 8 世紀時教會的偽作，而非如教廷宣稱是西元 4 世紀羅馬皇帝君士坦丁頒佈的真實文獻。大約同時，瓦拉探究古代拉丁文的發展史，認為拉丁文歷經長期的變遷，而羅馬共和後期與帝政早期是其「黃金時代」。他整理、歸納了黃金時代拉丁作家的字彙、語法、修辭等，寫成一本手冊《論拉丁文之美》（*Elegantiae latinae linguae*, c. 1440），作為學者學習優美的拉丁文的典範。此外，他更利用此種語言學方法來考訂古羅馬史家李維的《羅馬史》（*Ab Urbe condita*，英譯 *History of Rome*），訂正了李維文本中的一些錯誤，從而點出古典作品本身也未必如許多人文學者認為的，乃是絕對神聖、不容質疑的聖典。[24]此一發現有助於讓人文學者在心理上更易接受、順應古典的批評工作。

從瓦拉以後，「文本考訂」變成歐洲古典學術的中心工作，特徵是對古典作品進行嚴謹的批評與考證。經過學者們近 300 年的努力，到 18 世紀時，絕大部分的古代典籍幾乎都已經蒐羅、整理、考訂完竣了。18 世紀中期，啟蒙泰斗伏爾泰（Voltaire, 1694-1778）曾回顧說：「先前，在 16 世紀與 17 世紀大半時期，文人界投注許多時光在對希臘和拉丁作者進行文法的批評。由於他們的努力，我們有了各種辭典、考訂好的版

23 Rudolf Pfeiffer, *History of Classical Scholarship from 1300 to 1850*, p. 37. 學界對何者為近代古典學術的創立者有不同看法：葛洛推崇佛羅倫斯學者柏吉歐的成就，譽之為「近代古典學術的創立者」（H. W. Garrod, *Scholarship: Its Meaning and Value*, p. 23）；但 Pfeiffer 認為這有過譽之嫌，因柏吉歐雖作了一些文字訂正工作，實際上並非真正的「考訂」（emendare），且其成就也無超出時人之處（Rudolf Pfeiffer, *History of Classical Scholarship from 1300 to 1850*, p. 32 n）。

24 Charles G. Nauret, Jr., *Humanism and the Culture of Renaissance Europe*, pp. 36-42; Rudolf Pfeiffer, *History of Classical Scholarship from 1300 to 1850*, pp. 35-41.

臺灣大學術期刊資料庫

本，以及種種古代典籍的註疏。」[25]換言之，當青年吉朋在接受古典教育之時，與羅馬歷史相關的各種古典文本已經大致整理齊備了。

（三）「古物研究」的興盛

在文藝復興的復古運動中，人文學者除了發現、考訂古典文本之外，也從事古代文物的查訪與考掘工作。1337 年，佩托拉克首度造訪「永恆之城」，這座古都四處散布的古羅馬史跡，激發了他的歷史與考古興趣。他曾熱心地考察羅馬的地誌，觀賞古羅馬的藝術品，蒐集羅馬錢幣與銘刻之類的古物，甚至嘗試運用這類古物來作為歷史的證據。[26]佩托拉克可說是歐洲「古物研究」運動的先驅者，只是他對古物學的興趣遠不如對古籍研究的熱衷。在近代歐洲，古物研究之成為一門嚴謹的科學，主要應歸功於弗拉維歐．畢揚多（Flavio Biondo, 1393-1463）這位義大利人文學者的努力。

畢揚多出生於義大利的佛利（Forli）城，是一位幹練的公務員，長期在教廷擔任文書工作。他也是一位優秀的人文學者，對古代義大利歷史地理尤有研究。1444 年到 1446 年間，畢揚多對永恆之城進行了一次系統的考查。他蒐羅各種與羅馬相關的文本、考古、泉幣、銘刻與地圖等資料，加以科學的、嚴密地篩選、鑑別與解釋，目的是要「復原這座古城的自然外貌」。[27]他把這個研究成果整理成《古羅馬的復原》（*De Roma instaurata*）一書，確立了科學的古物學原理與方法。[28]畢揚多隨即

25 Voltaire, “Men of Letters,” in Diderot & D’Alembert, *Encyclopedia: Selections*, translated with an Introduction and Notes by Nelly S. Hoyt & Thomas Cassirer (Indianapolis: Bobbs-Merrill Company, Inc., 1965), p. 248.

26 John E. Sandys, *A History of Classical Scholarship*, vol. 2, p. 4; Roberto Weiss, *The Renaissance Discovery of Classical Antiquity*, 2nd ed. (Oxford: Basil Blackwell, 1988), pp. 30-38.

27 Jeffrey A. White, “Introduction” to Flavio Biondo, *Italy Illustrated*, vol. 1, books 1-4, ed. and trans. Jeffrey A. White (Cambridge, MA: Harvard University Press, 2005), p. x.

28 有關《古羅馬的復原》一書在歐洲古物研究史上的地位，參見 Roberto Weiss, *The*

臺灣大學學術期刊資料庫

以相同方法，投入義大利歷史地理與文物史蹟的調查，花了六年時間完成《描述古代義大利》（*Italia illustrata*, 1453）一書；最後，又在 1453 年至 1460 年出版《羅馬的榮光》（*De Roma triumphante*），有系統地整理、考訂古代羅馬的宗教、民政與軍事制度等。[29]畢揚多的研究開創了近代歐洲科學的「古物研究」運動。[30]

畢揚多之後，義大利人文學者持續古典古蹟的發現工作。他們研究羅馬地誌，調查義大利的古蹟，收集古代銘刻、泉幣與各種古物，成績相當可觀。[31]但在義大利文藝復興時期，古典作品的考訂畢竟才是主流，古物研究充其量只是附帶的興趣。然到 16 世紀後期，當文藝復興的中心轉移到法國後，由於古典作品的整理已漸齊備，古典學術的重心逐漸轉入古物的研究。北區人文學者處在相異的時空，有不同的學術關懷。他們並不像義大利人那樣熱衷回復古羅馬的精神，而更著重透過古代文物的考掘來重現羅馬古文明的物質面貌。

16 世紀以來，古物研究之所以漸受到歐洲古典學界重視，還有一個重要的哲學背景：「比羅懷疑論」（Pyrrhonism）的再興。比羅懷疑論原是西元 3 世紀的一個希臘哲學學派，核心人物是塞克斯塔（Sextus Empiricus, 活躍於 200 年前後）。塞克斯塔傳承了西元前 3、4 世紀希臘哲人比羅（Pyrrho of Elis, c. 360-275 B.C.）的懷疑主義，[32]著有《比羅懷疑論大綱》（*Hypotyposes*，英譯*Outlines of Pyrrhonism*）與《對各種學者

Renaissance Discovery of Classical Antiquity, pp. 66-70.

29 Jeffrey A. White, “Introduction” to Flavio Biondo, *Italy Illustrated*, vol. 1, books 1-4, ed. and trans. Jeffrey A. White, p. x.

30 Arnaldo Momigliano, *The Classical Foundations of Modern Historiography* (Berkeley, CA: University of California Press, 1990), pp. 70-71.

31 詳見 Roberto Weiss, *The Renaissance Discovery of Classical Antiquity*, chapters 7-13.

32 比羅主張理性無從透視事物的內在實體，充其量只能揣知事物的外表。每個人所見所知各有差異，真偽對錯無從絕對判定；人既對一切事物無法確知，就應終止其判斷，而任何判斷則應附加「大概」等概然語辭，以「在我看來似乎如此」之類不確定的語句來表達。詳見傅偉勳，《西洋哲學史》（臺北：三民書局，1987），頁 166-167。

臺灣大學學術期刊資料庫

的批判》（*Adversus mathematicos*）[33]兩書，來闡述比羅懷疑論的方法。塞克斯塔在《比羅懷疑論大綱》中提出一種論證：在討論真理時一旦遇到爭議，則必須有一個標準來判定真理屬誰；而「為斷定有關真理標準之爭議，又須有一個大家先行接受之標準，以憑判定這一爭議；然而為了取得此一先行接受之標準，對此一先行接受標準之爭議又須先行加以斷定」。如此一來，整個討論就陷入一種無止境的關於真理標準的爭議，而真理本身的尋找遂不可能。[34]塞克斯塔以這樣的論證方法，在《對各種學者的批判》一書中，對各種學問與教條進行全面性的攻擊，質疑任何聲稱可以達到真理的可能性。

古典時代結束之後，塞克斯塔的著作在西歐學術界消失了千年之久，直到 15 世紀中期才又重現在文藝復興的義大利。[35]當時，佛羅倫斯教士兼改革家沙凡納羅拉（Girolamo Savonarola, 1452-1498）曾以比羅懷疑論的方法，攻擊羅馬教會的神學權威與教條主義，呼籲回歸信仰本身。[36]到宗教改革時期，無論在新、舊教陣營，雙方神學家也都運用類似比羅懷疑論的方法作為論戰武器，揭發對方神學根基的不可靠，意圖顛覆對方神學教條的真理價值。[37]

16 世紀 20 年代中期，日耳曼學者亞格瑞巴（Henricus Cornelius Agrippa, 1486-1535）把比羅懷疑論的矛頭從神學爭論轉向批判俗世學問。亞格瑞巴在 1526 年出版《論藝術與科學的虛妄性》（*De incertitudine*

33 *Adversus mathematicos* 一書之書名，字面上的意思是「對數學家的批判」，不過，此書的前 6 卷全面地批評了各種學問，故又被稱為「對各種學者的批判」（*Against the Professors*）。

34 Sextus Empiricus, *Outlines of Pyrrhonism*, trans. R. G. Bury (Loeb Classical Library; Cambridge, 1939), book 2, chapter 4, sec. 20, pp. 163-165. 轉引自 Richard H. Popkin, *The History of Scepticism: From Savonarola to Bayle* (Oxford: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2003), p. 5.

35 有關 15 世紀中葉以來「比羅懷疑論」在西歐學術界重現的過程，詳見 Richard H. Popkin, *The History of Scepticism*, pp. 17-43.

36 Richard H. Popkin, *The History of Scepticism*, pp. 20-24.

37 Richard H. Popkin, *The History of Scepticism*, pp. 3-16.

臺灣大學學術期刊資料庫

et vanitate scientiarum et artium declamatio invectiva）一書，對各種知識活動與所有學問進行全面性的攻擊。[38]亞格瑞巴對世俗學術的批判也波及歷史學，對歷史知識的客觀性提出強烈質疑，形成一種「歷史比羅懷疑論」（historical pyrrhonism）。根據亞格瑞巴的論述，史家容易觸犯三大「惡德」：疏忽或輕信資料、刻意虛構事實與顛倒是非黑白。他檢討古代大小史家的著作，強調這些乃是史家的通病，並由是下結論說歷史知識難有確定性，「歷史中找不到確實的真相」。[39]義大利學者佩崔紀（Francesco Patrizzi, 1529-1597）進而質疑出現「好的史家」的可能性。一個好的史家必須要能夠客觀地呈現歷史的真相。但是，在佩崔紀看來，這是不可能達成的任務。史家要麼與事件的發生同時，要麼不是。若是後者，則史家因不是事件的見證人，無法陳述歷史真實；若為前者，則史家或為事件的同黨，或為中立人士。若是同黨，他會有強烈動機去歪曲、說謊，使真相不彰；而即便是後者，史家也難以獲知真相。因為，佩崔紀分析，史家一旦維持中立，就會因不是事件同黨而無法進入決策核心，遂看不到事件的原委。總之，無論從那個角度分析，我們都不可能期待有「好的」歷史家。[40]

在歷史比羅懷疑論的衝擊下，傳統史學的信譽面臨強烈的壓力。到17世紀，歷史家又時常捲入各國的宗教與政治紛爭，歷史書寫充斥各種偏見，失去了客觀、真實的本質。在這種情況下，歷史比羅懷疑論更是甚囂塵上，史學的發展充滿危機。不過，就在這個時機，歐洲學術界開始出現了一種自我檢討，試圖在傳統的歷史寫作之外，尋找更可靠的歷

38 亞格瑞巴是個虔誠的教徒、羅馬教會的支持者，著作本意是在為基督教的真理性作辯護。他對人文運動親近異教學問而輕視教會真理深不以為然，主張唯有耶穌基督與聖經才是真理之源，而所有的人間學問與知識皆是虛妄。參見 Richard H. Popkin, *The History of Scepticism*, pp. 28-29.

39 Julian H. Franklin, *Jean Bodin and the Sixteenth-Century Revolution in the Methodology of Law and History* (New York: Columbia University Press, 1963), pp. 89-96.

40 Julian H. Franklin, *Jean Bodin and the Sixteenth-Century Revolution in the Methodology of Law and History*, pp. 96-102.

臺灣大學學術期刊資料庫

史知識基礎。在這方面，古物研究運動扮演了重要的角色。[41]

傳統的史學主要是依賴「文字資料」來書寫歷史，但這類資料的可靠性受到歷史比羅懷疑論者的強烈質疑。文字史料通常是二手紀錄，易受到記錄者主觀的影響而失真，也容易遭偽造而失實，被認為並非可靠的歷史知識來源。由於傳統的文字史料遭到質疑，古人遺留的具體可見古物，如銘刻、紋章、泉幣、紀念物等，遂特別顯現出作為客觀史料的價值。[42] 17 世紀英國哲學家培根（Francis Bacon, 1561-1626）指出，「古物」是「遭受磨損的歷史，或無意間逃過時光磨難的歷史殘留」，是「從紀念碑、地名、歌辭、俗諺、傳說、私人紀錄和證言、斷簡殘篇等，保存或救回的一些資料」。在培根眼中，古代遺跡乃是一種「不完整的歷史」（unperfect history）。[43]近代的古物研究學者多少都帶有歷史比羅懷疑論心態，相信實證觀察比哲學教條可信；他們總是偏好具體可見的實物，認為客觀存在的物件是其出現的時代最佳的代言者。誠如西班牙學者阿古斯丁（Antonio Agustíny Albanell, 1516-1586）所說：「沒有比羅馬泉幣更可靠的了，那是羅馬官府擔保的正式文件。」[44]

在 17 世紀時，「古物研究」成為歐洲各國古典學術的重心，不但法國、英格蘭等文藝復興的後起之秀是如此，[45]甚至文藝復興起源地義大利的學術界也幾乎完全被攻占。[46] 17 世紀古物學的研究工作包含兩個層

41 Arnaldo Momigliano, “Ancient History and the Antiquarian,” in *Studies in Historiography* (London: Weidenfeld and Nicolson, 1966), pp. 10-11.

42 有關近代「古物研究」運動的發展，參見 Arnaldo Momigliano, *The Classical Foundations of Modern Historiography*, pp. 54-79; Arnaldo Momigliano, “Ancient History and the Antiquarian,” in *Studies in Historiography*, pp. 1-39.

43 Francis Bacon, *The Advancement of Learning* (London: J. M. Dent & Sons, 1962), p. 73.

44 Arnaldo Momigliano, *The Classical Foundations of Modern Historiography*, pp. 56-57.

45 關於 17 世紀法國的古物研究學術，參見 Peter N. Miller, *Peiresc's Europe: Learning and Virtue in the Seventeenth Century* (New Haven: Yale University Press, 2000)；至於 17 世紀英格蘭的古物研究學術，參見 Graham Parry, *The Trophies of Time: English Antiquarians of the Seventeenth Century* (Oxford: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1995).

46 John E. Sandys, *A History of Classical Scholarship*, vol. 2, pp. 279-282.

臺灣大學學術期刊資料庫

次：其一，廣泛地蒐集、整理、解讀具體的古物，如銘刻、泉幣、雕像、特許狀、遺跡、考古證據等，以萃取個別的古史事實。其二，根據蒐集到的事實來考證地誌、制度、習尚、宗教等古史專題。[47]換言之，近代歐洲的古物研究派意圖透過廣泛蒐集古代文物來研究、重建古代史，但他們對強調時序的傳統政治史與軍事史不感興趣，轉而重視對人種、習俗、法律、制度等古史專題進行深度的「系統性描述」。[48]結果，他們在傳統史著之外發掘到大量有關古典歷史的新證據與新課題，靜待有慧見的歷史家來利用，以書寫入史。

二、吉朋與古典學術的相遇

吉朋與近代歐洲古典學術傳統有長久的接觸期，其古典學術訓練可分為兩個階段。1753 年以前，他在英格蘭接受基礎的文法教育，閱讀了一些古典作品，然未能深入；1753 年之後，他被送到瑞士接受新教的教育，漸由基礎的古典閱讀進入「古典學術」的堂奧。

（一）基礎的古典訓練

吉朋出生在英格蘭一個典型的鄉紳家庭，自小接受當時一般鄉紳子弟接受的傳統古典教育。[49]根據其《自傳》，吉朋在七歲時（1744 年）接受啟蒙，在一位家庭教師的教導下開始習拉丁文。[50]兩年後，他進入家鄉普尼（Putney）附近的京士頓（Kingston-upon-Thames）學校，正式接受古典訓練。京士頓學校是一所「文法學校」，與當時多數學校一樣，

47 Arnaldo Momigliano, *The Classical Foundations of Modern Historiography*, pp. 58-59.

48 Arnaldo Momigliano, “Ancient History and the Antiquarian,” in *Studies in Historiography*, p. 3.

49 有關 18 世紀英格蘭鄉紳（gentry）階層子弟的教育，參見 G. E. Mingay, *English Landed Society in the Eighteenth Century* (London: George Allen & Unwin, 1956), pp. 131-141.

50 Edward Gibbon, *Autobiography*, pp. 22-24.

臺灣大學學術期刊資料庫

教學方法很傳統，但要求非常嚴格。[51]吉朋回憶在這裡「流了不少血淚後，取得拉丁語法知識」，並開始閱讀基本的拉丁古典，包括費德魯斯（Gaius Julius Phaedrus, c. 15 B.C.-c. A.D. 50）的拉丁文本《伊索寓言》（*Aesop's Fables*）、聶波斯（Cornelius Nepos, c. 100-c. 25 B.C.）的《名人傳》（*De viris illustribus*）。此外，他也學習了一些希臘古典文學，如文學家波普（Alexander Pope, 1688-1744）譯本的荷馬《史詩》。[52]

吉朋自幼體弱多病，經常臥病在床。臥病期間，他常藉閱讀打發時間，無意中培養出閱讀興趣，拉丁古典是主要閱讀對象。1747 年，他因病從京士頓輟學在家，期間曾自修德瑞登（John Dryden, 1631-1700）英譯的味吉爾（Publius Virgilius Maro, 70-19 B.C.）《阿尼亞德》（*Aeneid*）和歐威德（Publius Ovidius Naso, 43 B.C.-A.D. 17）《變形記》（*Metamorphoses*）等古典作品。1749 年，吉朋轉學到倫敦的「西敏寺學校」（Westminster School），卻又經常因健康問題輟學。1750-1752 年，吉朋被送回鄉間靜養，隨一位教士研讀賀瑞修（Quintus Horatius Flaccus, 65-8 B.C.）和味吉爾的拉丁詩，開始懂得「一種不完美的、淺略的品嚐拉丁詩人」。[53]這期間吉朋也讀了幾部英譯本的古典史著，如英格蘭古典學者里托貝利（Isaac Littlebury, 1657-1710）譯的希羅多德（Herodotus）《歷史》（*Histories*），史培爾曼（Edward Spelman, d. 1767）譯的色諾芬（Xenophon, c. 428-c. 354 B.C.）《居魯士遠征記》（*The Expedition of Cyrus*），蘇格蘭古物學者戈頓（Alexander Gordon, 1692?-1755）譯的塔西陀著作，與 17 世紀翻譯的普羅科比烏斯（Procopius of Caesaria, c. 500-562?）著作。[54]

---

51 關於英格蘭的「文法學校」傳統，見 Robin Davis, *The Grammar School* (Harmondsworth, Middlesex: Penguin Books Ltd., 1967), chapter 1. 有關早期文法學校的課程與教學方式，參見同書，pp. 42-46.

52 Edward Gibbon, *Autobiography*, pp. 24-27.

53 Edward Gibbon, *Autobiography*, pp. 29-30.

54 Edward Gibbon, *Autobiography,* p. 31. Geoffrey Keynes 編定的吉朋藏書目錄中，還列有上述史培爾曼與戈頓兩人的譯本。見 Geoffrey Keynes, *The Library of Edward Gibbon*,

臺灣大學學術期刊資料庫

吉朋的健康狀況在這之後奇蹟似地好轉，終於可以過正常的學生生活了。1752 年，他被送進牛津大學，成為莫德林學院（Magdalen College）「特別自費生」（gentleman-commoner）。當時，牛津大學的學風散漫，教師無心教學，學生也志不在學問。[55]這種散漫風氣無法滿足青年吉朋的強烈求知慾。吉朋在牛津期間的讀書狀況雖然不佳，但在導師的指導下，仍讀了特倫斯（Publius Terentius Afer, d. 159 B.C.?）的「三、四齣拉丁喜劇」，以提昇拉丁文的基礎能力。[56]

（二）進入古典學術殿堂

在牛津就學期間，吉朋因導師疏於督導，而有機會接觸到 17 世紀法國主教鮑蘇埃（Jacques-Bénigne Bossuet, 1627-1704）的神學著作，研讀其《天主教教義闡釋》（*Exposition of the Catholic Doctrine*）與《基督新教發展史》（*History of the Protestant Variations*）兩書，不知不覺中受其宗教思想的吸引，終至受洗為天主教徒。[57]在 18 世紀的英格蘭，天主教仍然受到法律的禁制，受洗為信徒更是政治上的大禁忌。吉朋父親知悉兒子改宗後相當震驚，為免影響吉朋前途，遂決定將其送往瑞士接受宗教改造，期待其重皈新教信仰。1753 年 6 月 30 日，吉朋抵達洛桑（Lausanne），在新教牧師巴維立亞（Daniel Pavilliard）監護下，接受新教教育與古典訓練。吉朋在洛桑的五年教育，對爾後他的學術生涯起了關鍵性的影響。

初到洛桑的吉朋，首先必須學習新的語言法文，以便適應陌生的新環境。為此，巴維立亞牧師督導吉朋每天練習兩次法文，效果甚佳。不

Second Edition (Dorchester, 1980), pp. 261, 286.

55 吉朋對當時的牛津大學甚感失望，在《自傳》中對其學風有很不客氣的批評，參見 Edward Gibbon, *Autobiography*, pp. 37-40.

56 Edward Gibbon, *Autobiography,* p. 42.

57 有關少年吉朋改宗天主教始末，見 Edward Gibbon, *Autobiography*, pp. 45-48. 鮑蘇埃兩部書的法文原著是 *Exposition de la doctrine de l'Eglise catholique sur les matieres de controverse* (1680); *Histoire des variations des eglises protestantes* (1688).

臺灣大學學術期刊資料庫

過一個月的時間，他就有了基本的聽、講能力。[58]宗教的改造花費較長的時間。吉朋的心靈一直在天主教與新教之間擺盪，最後確實導向了新教，但對他而言，洛桑的長老會與英國國教仍有不少隔閡，需要加以克服。無論如何，到 1755 年 2 月，吉朋終於化解了疑惑，正式宣告重新變回一個「好新教徒」了。[59]

完成宗教改造之後，吉朋才開始系統地接受古典學術訓練。巴維立亞是個牧師，學術雖非專精，但「對各種類別的文學都有一些正確的，雖甚粗淺的知識」，更重要的是他「懂得如何開啟他的英國學生的心靈」。[60]不過，吉朋需要提昇語言的能力，以滿足進一步的學術研究需求。從 1755 年 4 月起，吉朋花了 9 個月的時間勤習法文與拉丁文。過去他對這兩種語言「懂得非常膚淺」，但現在很快就「完全地精通」了。[61]在 17、18 世紀，法國執歐洲古典學術牛耳，法文與拉丁文則是古典學界的兩種主要語言。吉朋精通了這兩種語言，就等於擁有打開通往歐洲古典學術殿堂的兩把鑰匙。

巴維立亞牧師是一位態度嚴謹、教學有方的老師，他幫吉朋擬定一套教學計畫，引導這位學生「批判性地閱讀法文與拉丁文的古典」，使其逐漸「從盲目、毫無徵別的閱讀，進入正式的教授之路」。[62]吉朋的古典訓練進展得很快，到 1756 年時已自認可以獨立的、有系統的研究拉丁古典了。

---

58 Jane E. Norton, ed., *The Letters of Edward Gibbon* (London: Cassell and Company Ltd., 1956), vol. 1, p. 2, "To Edward Gibbon, Sen. Mon. 31/7/53".

59 Jane E. Norton, ed., *The Letters of Edward Gibbon*, vol. 1, p. 5, "To Catherine Porten [Feb. 1755]".

60 Edward Gibbon, *Autobiography*, p. 59.

61 吉朋自稱在 1755 年僅花了 9 個月，就「使自己完全精通法文和拉丁文」。D. M. Low, ed., *Gibbon's Journal To January 28th, 1963* (New York: W. W. Norton & Company, 1929), p. 4. 有關吉朋在洛桑的生活，參見楊肅献，〈青年吉朋：一位羅馬帝國歷史家的養成〉，《新史學》第 12 卷第 2 期（2001，臺北），頁 64-72。

62 Edward Gibbon, *Autobiography*, pp. 59-62.

臺灣大學學術期刊資料庫

在 1756 年與 1757 年，吉朋自己規劃了一個很具雄心的讀書計畫。他依照「歷史」、「詩」、「演說」與「哲學」四類，列出拉丁古典作者，再按年序逐部精心研讀，「從普勞塔斯（Plautus, c. 250-184 B.C.）和沙魯斯特（Sallust, 86-35 B.C.）的時代，一直到羅馬帝國與其語言的衰亡為止」。[63]吉朋在《日誌》中留有讀書紀錄：

1. 詩人：味吉爾、台布魯斯（Tibulus, 55-19 B.C.）、卡圖勒斯（Catullus, c. 85-c. 54 B.C.）、普羅波西烏斯（Propertius, c. 50-16 B.C.）、賀瑞修、歐威德。
2. 史家：沙魯斯特、李維、維列烏斯（Velleius Paterculus, c. 19 B.C.-A.D. 30）、瓦勒瑞烏斯（Valerius Maximus, 1 世紀初）、塔西陀、蘇東尼烏斯（Suetonius, c. 69-?）、科西烏斯（Quintus Curtius, 1 世紀）、查士丁（Justin, 2 或 3 世紀）、弗羅魯斯（Florus, 2 世紀）與笛歐等。
3. 戲劇：普勞塔斯、特倫斯。
4. 哲學：魯克瑞修（Lucretius, c. 99-c. 55 B.C.）。[64]

後來吉朋宣稱：「這個讀書計畫，我在洛桑的最後二十七個月進行，幾乎將其完成。」[65]這一批典籍涵括大部分重要的拉丁古典，其中多數後來都出現在《羅馬帝國衰亡史》的註腳中。

吉朋在這個閱讀計畫中很講求讀書方法，務求能透徹理解古代經典。他回憶這回的讀書說：「我命自己研讀特倫斯、味吉爾、賀瑞修、塔西陀等人兩遍，甚至三遍。……我絕不漏掉任何一個困難或訛誤的段

63 Edward Gibbon, *Autobiography*, pp. 69-70. 普勞塔斯是西元前 2、3 世紀的羅馬劇作家，寫過 130 部劇本，其中有 20 部存留，是後世所見最古的拉丁文作品；沙魯斯特是西元前 1 世紀羅馬史家，著有 *Bellum Catilinae*、*Bellum Iugurthinum* 與 *Historiae* 三書。有關兩位拉丁作家的生平，參見 M. C. Howatson & Ian Chilvers, eds., *Oxford Concise Companion to Classical Literature* (Oxford: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1993), pp. 430-431, 477-478.

64 D. M. Low, ed., *Gibbon's Journal*, p. 5.

65 Edward Gibbon, *Autobiography*, p. 70.

臺灣人文學術期刊資料庫

落。」在閱讀過程中，他也經常參考「最博學或最有創見的註釋家的見解」，例如：

> 讀賀瑞修則參考托倫修斯（Hermann Torrentius, 1450-1520）與達西爾（Andre Dacier, 1651-1722）、讀味吉爾則參考卡特羅（Francois Catrou, 1659-1737）與瑟維烏斯（Marius Servius Honoratus, 4 世紀末）、讀歐威德則參考梅吉立亞克（Claude Meziriac, 1581-1638）、讀塔西陀則參考利比西烏斯（Justus Lipsius, 1547-1606）。[66]

瑟維烏斯是 4 世紀的羅馬文學家，以註釋味吉爾而著名。卡特羅是法國歷史家，翻譯了味吉爾的作品，並作了評註。托倫修斯是荷蘭的古典學者、格諾寧根（Groningen）大學的修辭學教授。達西爾是法國古典學者，曾翻譯亞里斯多德的《詩學》，編訂賀瑞修的作品，並譯成法文。梅吉立亞克是法國數學家與古典學者，編註有歐威德的《書信集》。利比西烏斯則是 16 世紀荷蘭的古典學大師，以考訂、註釋塔西陀的著作成名。吉朋反覆地參考了這些古典專家的專業見解，在這個過程中獲得了「一大堆歷史的與考證的知識」。[67]

吉朋的古典學知識增長快速，洛桑的環境漸無法滿足其求知慾。在求知慾的驅使下，吉朋轉向洛桑以外的學術界尋求協助。1756 至 1757 年，吉朋以匿名方式與幾位歐洲古典學者通信，包括：巴黎大學古典學教授、李維專家克雷維業（Jean B. L. Crevier, 1693-1765），蘇黎世大學希臘文與希伯來文教授布列丁格（Johan Jacob Breitinger, 1701-1776）與漢諾威哥廷根（Gottingen）大學古典文學教授葛斯訥（Johann Matthias Gesner, 1691-1761）。[68]吉朋向他們請益希臘與拉丁古典考訂問題，以解決自己在研讀古典的過程中產生的疑惑或難題。他對此一經驗甚感自傲：「能自由地與這麼著名和博學的批評家互相辯難，讓我意識到自己

66 Edward Gibbon, *Autobiography*, p. 70; D. M. Low, ed., *Gibbon's Journal*, p. 5.

67 Edward Gibbon, *Autobiography*, p. 70.

68 Edward Gibbon, *Autobiography*, pp. 78-80; Jane E. Norton, ed., *The Letters of Edward Gibbon*, vol. 1, p. 37, "To Catherine Porten [c,15/11/56]".

臺灣大學學術期刊資料庫

的實力，因此深受鼓舞。」[69]

（三）與歐洲古典學界的交會

1758 年，吉朋結束五年的「流放」生活，回到了英格蘭，卻也因而離開法文的學術環境。儘管如此，他對古典學術的熱情不曾消退，仍「非常勤奮造訪此一派古典文學」。[70]由於不再有巴維立亞牧師的指導，吉朋必須要獨立問學。從 1759 年到 1763 年，他主要是透過幾個法文的古典期刊與歐洲古典學界保持接觸，如《皇家銘刻與藝文學院集刊》（*Mémoires de l'Académie royale des Inscriptions et Belles-Lettres*）、《博學學報》（*Journal des Savans*）、《科學與藝文彙刊》（*Bibliothèque des Sciences et des Beaux Arts*）、《寰宇評論》（*Bibliothèque universelle*）與《圖書評論》（*Bibliothèque Raisonèe*）等。這些期刊載有各種學術訊息，摘錄、評介新出版的古典論著，成為爾後吉朋重要的精神食糧，以及古典研究訊息、知識的重要來源。

在這期間，歐洲各國正在打七年戰爭（Seven Years War, 1756-1763），英國政府為了防範法國入侵，下令各郡成立民兵營以協助保境安民。1759 年，吉朋奉父親之命加入「罕布夏郡民兵南營」（South Battalion of Hampshire Militia），擔任上尉軍官之職。[71]在三年多的時間裡，吉朋忙於民兵軍務，跟隨部隊操練、行軍、紮營與社交，但他仍在公餘之暇抽空讀書，而《皇家銘刻與藝文學院集刊》、《博學學報》與《科學與藝文彙刊》等就成為其軍旅中的重要知識伴侶。其中，《皇家銘刻與藝文學院集刊》對吉朋的學術發展影響最深。

「皇家銘刻與藝文學院」（Académie royale des Inscriptions et Belles-Lettres）的前身是「皇家銘刻與紋章學院」（Académie royale des

臺灣大學學術期刊資料庫

69 Edward Gibbon, *Autobiography*, p. 79.

70 Edward Gibbon, *Autobiography*, p. 93.

71 有關吉朋的民兵營生涯，參見楊肅献，〈青年吉朋：一位羅馬帝國歷史家的養成〉，《新史學》第 12 卷第 2 期，頁 73、87-90。

Inscriptions et Médailles），乃是路易十四（Louis XIV）時財政大臣柯爾貝（Jean-Baptiste Colbert, 1619-1683）在 1663 年設立的一個小委員會，隸屬於「法蘭西學院」（Académie Française）。這個機構延攬博學的古典學者為委員，替王室頒行的紋章或紀念物蒐求、審定適當拉丁格言和銘文，意在表彰國王的豐功偉績。1683 年，皇家銘刻與紋章學院擴大學術規模，發展出考古、泉幣、金石與語言等部門。1701 年，銘刻與紋章學院從法蘭西學院獨立出來，並在 1716 年更名為「皇家銘刻與藝文學院」，且決定出版期刊，刊登歷史、考古、語言學、泉幣學、金石學等方面的學術訊息與論文。

在 18 世紀時，皇家銘刻與藝文學院是歐洲古典研究的重鎮，在古典學界的聲望崇高。吉朋曾讚揚這個機構是「博學、觀點精確與文雅的結合，在其中可碰到許多重要發現，……或有時是一種謹慎、飽學的無知，這比路易十四以野心帶來的其他邪惡勝利，更能讓他名垂不朽」。[72]當世法國著名的古典學者大都是學院成員，如古文書學大師馬比揚（Jean Mabillon, 1632-1707）、古文字學大師孟福貢（Bernard de Montfaucon, 1655-1741）、古物學者福列瑞（Nicolas Fréret, 1688-1749）、比較史學先驅布羅塞斯（Charles de Brosses, 1709-1777）、歷史地理學者丹維爾（Jean-Baptiste Bourguignon d'Anville, 1687-1782）、古藝術專家凱勒斯（Comte de Caylus, 1692-1765）、近東銘文專家巴特勒密（Jean-Jacques Barthélemy, 1715-1795）、印度學家杜泊榮（Anquetil-Duperron, 1731-1805）等。

吉朋與《皇家銘刻與藝文學院集刊》的接觸應始於 1758 年以前，他在這年 3 月開始處女作《論文學研究》（*An Essay on the Study of Literature*）的寫作時，曾多方引用這個期刊的論文。[73]吉朋喜愛其內容，

72 Edward Gibbon, *An Essay on the Study of Literature* (London: T. Becket and P. A. De Hondt, 1764), p. 10; Edward Gibbon, *Autobiography*, p. 93.

73 吉朋寫《論文學研究》第 2 節時，首次引用《皇家銘刻與藝文學院集刊》第 4 卷的文章。按照吉朋的日誌，這一節是在 1758 年 3 月寫成，見 D. M. Low, ed., *Gibbon's Journal*, p. 7.

臺灣大學學術期刊資料庫

推崇為「博學的與多樣的集刊」。1759 年，吉朋一回到英格蘭，在拿到第一筆生活津貼後，就迫不及待地去買下這套期刊。他在《自傳》中談到當年奔赴書店買書時的喜悅心情：

> 我收到第一季生活津貼後，立即將大部分用在文學需求上。我難以忘懷，當我拿一張二十英鎊鈔票去交換那二十卷銘刻學院集刊時心中那種快樂。同一筆錢花在其他種花費，也不易買到這麼豐富的理性娛樂。[74]

1761 年 4 月到 1762 年 8 月間，吉朋密集地閱讀此一期刊登載的古典學術研究論著。[75]這是他從洛桑回到英格蘭後與法國古典學術接觸的最重要管道，也是他後來書寫《衰亡史》時最常引證的古典資料來源。[76]

《博學學報》創刊於 1665 年，是歐洲最早的一份學術期刊。創刊主編德沙羅（Denis de Sallo, 1626-1669）是一位法國作家與律師，受王室之託辦此期刊，以刊載「文人界的任何新聞」，內容將包含「歐洲出版的主要圖書的正確目錄，且不單只列出目錄，還要說明其內容與用處為何」。[77]《博學學報》刊載古典學界的研究成果、科學界的研究發現、學界的動態、名人的誄辭、法庭的報導等。[78]在 1761 年 10 月，吉朋的《論文學研究》出版後，《博學學報》立即大幅摘要報導，並給予很好的評論。[79]吉朋在《日誌》中提到此一刊物「非常推崇我的書」，內心甚受鼓舞。[80]他在 1761 年 11 月至 1762 年 12 月間陸續閱讀《博學學

74 Edward Gibbon, *Autobiography*, p. 93.

75 D. M. Low, ed., *Gibbon's Journal,* pp. 24, 31, 33, 35, 36, 38, 86, 90, 95, 101, 106, 108.

76 根據馬欽的統計，《衰亡史》一書引用《皇家銘刻與藝文學院集刊》多達 120 次。見 I. Machin, "Gibbon's Debt to Contemporary Scholarship," *Review of English Studies* 15, p. 86.

77 引自 David Maland, *Culture and Society in Seventeenth-Century France* (London: B. T. Batsford Ltd., 1970), p. 290.

78 Harcourt Brown, "History and the Learned Journal," *Journal of the History of Ideas* 33, no. 3 (1972, Philadelphia), pp. 365-378.

79 見 *Journal des Savans,* October 1761 (Paris), pp. 689-694.

80 D. M. Low, ed., *Gibbon's Journal*, p. 42.

臺灣大學學術期刊資料庫

報》，[81]給予極高的評價：「我不知如何才能表達對這個學報的喜愛，其特色是博學、精確與識見；但我最敬佩的是其公正與坦誠，能夠指出一部著作的優點與缺點，予前者真誠而恰當的讚揚，同時冷靜而溫和地點出後者。」這個刊物「是所有學報的先驅，但仍然較它們為優」，他對這個學報的唯一意見是「稍欠一點兒大膽與哲學」。[82]

同一期間，吉朋也閱讀了《科學與藝文彙刊》。[83]這個期刊在 1761 年 10 至 12 月號也摘要、評論《論文學研究》，吉朋讀後在《日誌》中表示：「他們給予很高的評價，且預言我會出頭。」[84] 1762 年 5 月到 7 月，吉朋改以勒克拉克（Jean Le Clerc, 1657-1736）主編的《寰宇評論》作為「閒暇時的閱讀」，[85]提供他一個「無窮的娛樂與知識的寶庫」。[86] 最後在 1763 年 8 月到 1764 年 3 月，吉朋在洛桑為進入義大利旅行作準備時，還努力研讀荷蘭的古典研究期刊《圖書評論》，讀完 50 卷中的 37 卷。[87]《圖書評論》分為兩部分，篇幅大致相等、但性質完全相異。第一部分刊載許多神學、法學與古典文學論著，吉朋讚美其「契合 17 世紀風行的真正學術品味，……旁徵博引結合恰當的批評」；但是第二部分的文章，他抱怨說，在口味上與 18 世紀接近，混合有「對神學的冷漠，皮相的學問與魯莽的思維；語氣教條獨斷，文章簡短破碎、虛浮不實」。[88]吉朋雖然積極吸收當代學界的研究果實，但仍保留了自己的獨立評斷標準。

---

81 D. M. Low, ed., *Gibbon's Journal*, pp. 42, 90, 92, 93, 94, 96, 187.

82 Edward Gibbon, "Extraits de Mon Journal," in *The Miscellaneous Works of Edward Gibbon, Esq.* (London, 1814), vol. 5, pp. 442-443.

83 D. M. Low, ed., *Gibbon's Journal*, pp. 42, 66, 88, 187.

84 D. M. Low, ed., *Gibbon's Journal*, p. 66.

85 D. M. Low, ed., *Gibbon's Journal*, pp. 79, 84, 87, 100.

86 D. M. Low, ed., *Gibbon's Journal*, p. 79.

87 Edward Gibbon, "Extraits de Mon Journal," in *The Miscellaneous Works*, vol. 5, pp. 289-474, *passim*.

88 Edward Gibbon, "Extraits de Mon Journal," in *The Miscellaneous Works*, vol. 5, p. 474.

臺灣大學學術期刊資料庫

（四）為古典學術而辯

吉朋在 1761 年出版《論文學研究》，目的是要為古典研究的價值進行辯護。此時，青年吉朋何以要挺身為古典學術而辯？原來，當吉朋潛心古典研究時，歐洲學風已經發生重大變化。自 17 世紀以來，歐洲學界革新知識探索方法，探索對象也從古典轉向自然，在「自然哲學」（Natural Philosophy）上——主要是數學、物理學與天文學——有突破性成就。自然哲學由是躍升為新的顯學，而埋首故紙堆的古典學術則漸受到冷落。在 18 世紀中期，伏爾泰觀察到此一變動說：「今日，這種考訂工作已不再那麼需要，業已讓位給哲學的精神了。」[89]在啟蒙聖地的法國，古典學術的處境似乎更困難。吉朋抱怨說：

> 在法國……希臘與羅馬的學問與語文，橫遭一個哲學的時代所忽略。這類學術的守護神皇家銘刻與藝文學院，被降為巴黎三個皇家學院中地位最低者。卡紹本（Isaac Casaubon, 1559-1614）與利比西烏斯的後繼者們，則被鄙視地冠以「學究」（Erudits）此新稱號。[90]

1756 年與 1757 年間，吉朋正積極投入古典閱讀，對古典學術懷抱熱情，堅信其知識價值。他不滿古典學術的遭遇，遂發出不平之鳴：「我企圖以自己作實例……證明古典研究可以磨練和展現各種心智能力。」[91]

吉朋寫《論文學研究》，據其自傳，表明要與啟蒙哲士達冷柏（Jean Le Rond d'Alembert, 1717-1783）針對古典學術問題進行一次對話。1751 年，狄德羅（Denis Diderot, 1713-1784）與達冷柏主編的《百科全書》（*Encyclopédie, ou dictionnaire raisonné des sciences, des arts et des métiers*）首卷問世，達冷柏寫一篇〈導論〉（"Discours preliminaire a l'Encyclopedie"），闡述其著作精神與知識架構。哲學家培根曾提出一種

89 Voltaire, "Men of Letters," in Diderot & D'Alembert, *Encyclopedia: Selections*, translated with an Introduction and Notes by Nelly S. Hoyt & Thomas Cassirer, p. 248.

90 Edward Gibbon, *Autobiography*, p. 95.

91 Edward Gibbon, *Autobiography*, p. 96.

臺灣大學學術期刊資料庫

知識論，將人的心智能力分為「記憶」、「想像」與「推理」三個層次，並對應這三種能力，把知識分為「歷史」、「藝術」與「哲學」三大領域。[92]達冷柏循培根知識分類理念，在〈導論〉中將文學界分為「學者」、「藝術家」與「哲學家」三類。他發現這三類文人各有專長，並無共同之處，卻常彼此相輕：學者恆輕視詩人與哲學家，以其所著為無事實依據之空話，相對地，「詩人與哲學家……鄙視學者為一群可憐蟲，只想到堆積而不懂得品賞，把最下等與最貴重的紋章全無徵別地堆在一塊」。[93]

達冷柏考察人類心智的成長程序，主張學術的演進會循著一個自然的歷程：起始於「博學」，繼之以「藝文」，完成於「哲學」。[94]近世歐洲學術的發展正符合這個歷程。古典時代結束之後，古人遺留的學問漸遭到遺忘，科學與藝術原理隨之流失；直到文藝復興運動，達冷柏指出，人們方擺脫「野蠻狀態」，心智重新獲得活力，四處都出現「啟蒙的再生」。[95]但在當時，人們依其心智狀況容易就導向本於「記憶」的學問，如「語言」與「歷史」：

> 剛脫離野蠻時，人們發現自己的心智尚處於幼稚階段，雖渴望累積觀念，但因心智長期處於懶散狀態，尚無能力取得較高層次的觀念。而在所有心智能力中，最先開發的是記憶，因其最容易得到滿足，而藉其協助取得的知識也最容易建立。[96]

而此時適有古代典籍的發現，人們遂自然地投入古典研究領域：

> 他們以為只須閱讀，即可變得有學問；而閱讀遠比理解容易。於是，他們全無徵別地狼吞虎嚥所有古人留下的著作。他們翻譯、作註解，

92 Francis Bacon, *The Advancement of Learning*, edited with an Introduction by G. W. Kitchin, p. 69. 參見傅偉勳，《西洋哲學史》，頁 256。

93 Jean Le Rond d'Alembert, *Preliminary Discourse to the Encyclopedia of Diderot*, trans. Richard N. Schwab (Chicago: University of Chicago Press, 1995), pp. 51-52, 55-56.

94 Jean Le Rond d'Alembert, *Preliminary Discourse to the Encyclopedia of Diderot*, p. 60.

95 Jean Le Rond d'Alembert, *Preliminary Discourse to the Encyclopedia of Diderot*, pp. 61-62.

96 Jean Le Rond d'Alembert, *Preliminary Discourse to the Encyclopedia of Diderot*, p. 63.

臺灣大學學術期刊資料庫

並出於感激而開始崇拜之，雖尚不了然其真價值。[97]

這樣產生了一批在達冷柏看來是炫學、自大的「博學之士」。他們「浸淫於各種古典語言，寖至輕蔑自己的語言；他們博曉古人種種事物，然對其幽雅精緻處卻不甚了了；他們的虛榮、炫學導致如此自大」。[98]

達冷柏在〈導論〉中對古典學者多所嘲弄。他嘲笑這些人「驕傲地從事一種困棘的、常是可笑的、有時是野蠻的學問，還引以為榮」。[99]他暗諷古典研究乃是一種最低層次的知識探索：「記憶包含吾人所有知識的基本材料，學者的著作經常提供各種素材，給哲學家與詩人來鍛鍊其智能。」[100]他聲稱過去那些著名的古典學者如今已不再受到尊榮：「今日，鄙視他們被認為是一種正當的作為；實際上，許多人還以此為傲。」這個時代「似乎是嘗試以吾人的輕蔑，來懲罰這些學者的過度自負；……而當把這些偶像踩在腳下時，吾人似乎希望使其連名字都被遺忘」。[101]

對古典學術命運的如此起落，吉朋相當感慨：「那個時代，人們覺得研究、尊崇古人是一種高尚成就；這個時代，人們卻以為忽視、輕賤古人比較安然與文雅。」[102]吉朋有意替古典學術討公道，乃於 1758 年 3 月動筆寫作《論文學研究》。這本書原是針對法國文化界而寫，故原本是以法文寫成，之後才譯成英文。他在書名中使用了「文學」（littérature）一詞，實際上是指謂「古典學術」或「博學研究」（Erudition）。

《論文學研究》一開始就指出學術猶如時尚，常隨時代而變動：希臘化時期是邏輯與形上學，羅馬共和時期是政治與修辭學，奧古斯都時代是歷史與詩，羅馬帝國晚期是文法學與法學，13 世紀時是士林哲學，近代則是古典文學。這些學問「都曾經各領過風騷，也都先後遭到輕

97 Jean Le Rond d'Alembert, *Preliminary Discourse to the Encyclopedia of Diderot*, p. 63.
98 Jean Le Rond d'Alembert, *Preliminary Discourse to the Encyclopedia of Diderot*, p. 63.
99 Jean Le Rond d'Alembert, *Preliminary Discourse to the Encyclopedia of Diderot*, p. 64.
100 Jean Le Rond d'Alembert, *Preliminary Discourse to the Encyclopedia of Diderot*, p. 56.
101 Jean Le Rond d'Alembert, *Preliminary Discourse to the Encyclopedia of Diderot*, p. 64.
102 Edward Gibbon, *An Essay on the Study of Literature*, p. 6.

臺灣大學學術期刊資料庫

蔑」，[103]但吉朋主要是關注「古典學術」的近代命運。1453 年君士坦丁堡陷落後，古典學者星散；後來，佛羅倫斯麥迪奇家族（the Medici）提供贊助，重新匯集學者，才促成文藝的復興，將「荷馬和西賽羅傳布到亞歷山大所不知之地，與羅馬未曾征服的國度」。[104]古典學術由是逐漸開展，而在路易十四的法國達到顛峰。當時，法國學界受笛卡爾哲學的啟迪，精進了古典考訂的方法，樹立了新學風；另一方面，路易十四也獎掖學術，贊助成立幾個學會，包括被吉朋視為古典學術守護神的「皇家銘刻與藝文學院」。一時之間，法國古典學者輩出，包括博蘇（René Le Bossu, 1631-1680）、布瓦羅（Nicolas Boileau-Despreaux, 1636-1711）、拉賓（René Rapin, 1621-1687）與布魯莫（Pierre Brumoy, 1688-1742）等人，都致力「向社會宣示古典文學的價值」。[105]

然而，好景不常。吉朋發現從這時期起古典學術開始步入衰運。隨著自然哲學的興起，古典學術相形失色：「今日，自然哲學與數學登上王座：其姊妹學問伏撲在它們跟前，屈辱地鍊在它們車後，被奴隸般地驅使來點綴其勝利。」[106] 1690 年代至 1730 年代，西歐學界爆發一場文化論戰，史稱「古今之爭」（Quarrel of the Ancient and the Moderns）或「書籍之戰」（Battle of the Books），爭論古學與今學之優劣。[107]在這場論戰中，吉朋說，古典學術遭到致命的一擊。當時，「今人派」陣營出現一批厲害的能手，如泰拉松（Jean Terrasson, 1670-1750）嚴謹的邏輯，封騰內爾（Bernard Le Bovier de Fontenelle, 1657-1757）精密的哲

103 Edward Gibbon, *An Essay on the Study of Literature*, pp. 2-4.

104 Edward Gibbon, *An Essay on the Study of Literature*, pp. 5-6.

105 Edward Gibbon, *An Essay on the Study of Literature*, p. 10. 吉朋在《自傳》中點出，這個學會是「皇家銘文與紋章學院」，Edward Gibbon, *Autobiography*, p. 93.

106 Edward Gibbon, *An Essay on the Study of Literature*, pp. 4-5.

107 有關「古今之爭」，詳見 Richard F. Jones, *Ancients and Moderns: A Study of the Rise of the Scientific Movement in Seventeenth-Century England* (Gloucester, Mass.: Peter Smith, 1961, 1975); Joseph M. Levine, *The Battle of the Books: History and Literature in the Augustan Age* (Ithaca: Cornell University Press, 1991).

臺灣大學學術期刊資料庫

學，拉摩特（Antoine Houdar de la Motte, 1672-1731）絕妙、適當的風格，以及聖．海亞新特（Thémiseul de Saint-Hyacinthe, 1684-1746）直爽的嘲弄。[108]他們協力對古人發動猛攻，寖至「把荷馬貶低到與夏培林（Jean Chapelain, 1595-1674，法國詩人）之流的同等地位」。[109]面對這種攻擊，吉朋抱怨說，「古人派」的回應卻流於「瑣碎」，充滿「偏見、謾罵與吊書袋」。這不但無助於護衛古典，反而對其造成傷害，因「嘲弄雖是全衝著古人派而來，然古人——這次爭論主題——卻連帶遭殃」。[110]

《論文學研究》意在駁斥達冷柏之輩對古典研究的輕蔑。吉朋承認說，一個具備獨立思考能力與活潑想像力的人，不可能喜好一種僅靠記憶的學問。但在他看來古典學術絕非只是記頌之學，而和其他學問一般能磨礪人的各種智能。吉朋考察近代的「才智之士」，發現許多人完全投入古典研究，有更多人曾鼓勵、雖未深入耕耘，但是「他們幾乎無人曾經鄙視之」。義大利科學家卡西尼（Giovanni Domenico Cassini, 1625-1712）在天文發現成名前，曾浸淫於古代占星術；著名科學家牛頓（Isaac Newton, 1642-1727）並不避諱去考訂古代的紀年系統；法國學者賈申迪（Pierre Gassendi, 1592-1655）曾探究伊比鳩魯（Epicurus, 341-270 B.C.）的著作，為其思想辯護；日耳曼學者萊布尼茲（Gottfried Wilhelm von Leibnitz, 1646-1716）則擱置了歷史研究，改研究古代數學，考訂 5 世紀數學家卡培拉（Martianus Minneus Felix Capella）的著作。[111]

---

108 Edward Gibbon, *An Essay on the Study of Literature*, p. 11. 有關泰拉松、封騰內爾、拉摩特與聖‧海亞新特等人對希臘文學的批評，參見 Joseph M. Levine, *The Battle of the Books: History and Literature in the Augustan Age*, pp. 140-145.

109 Edward Gibbon, *An Essay on the Study of Literature,* p. 11. 此處，吉朋指的應是 1714 年聖．海亞新特發表的 “Dissertation sur Homère et sur Chapelain” 一文，此文收入 Thémiseul de Saint-Hyacinthe, *Chef d'oeuvre d'un inconnu* (Amsterdam, 1714).

110 Edward Gibbon, *An Essay on the Study of Literature*, pp.11-12.

111 Edward Gibbon, *An Essay on the Study of Literature*, pp. 13-14. 按：牛頓在晚年出版了 *The Chronology of Ancient Kingdom Amended* (London, 1728)一書；賈申迪在 1647 至 1655 年間，寫有論伊比鳩魯哲學的三大論著：*De vita et moribus Epicuri* (1647)、*Animadversiones*

臺灣大學學術期刊資料庫

在近代學者中，吉朋指出，笛卡兒（Rene Descartes, 1596-1650）是少數完全投入自己的哲學、並鄙夷其他學問的學者。至於其他學者，則或多或少都曾從事古典研究，並從中獲得學問上的益處。荷蘭學者葛羅修斯（Hugo Grotius, 1583-1645）即因「通曉全部的古代知識」，遂能「揭開古代神諭，打擊無知與迷信，減緩了戰爭的災難與恐怖」。他在國際法經典《論戰和之法》（*De Jure Belli ac Pacis*, 1625）中的論述，顯然是基於堅實的古典學術根基。這些學者的身體力行，足以證明古典文學研究本身「具有正當性」。[112]然而儘管例證歷歷，啟蒙知識界卻視而不見，刻意輕賤古典學術：「我們的哲學家一直假裝震驚，說居然有人能終其一生都在獲取僅屬於字詞與事實的知識，塞滿了記憶卻未能增進理解力。而我們的機智之士則充分知道可占讀者無知的便宜，遂大肆輕賤古人與古典研究者。」[113]這是吉朋最感不平之處。

《論文學研究》是文化史上「古今之爭」的一段微弱終曲，卻是古典學術與啟蒙精神的一個有趣對話。吉朋結合了理論與實例，力圖扭轉啟蒙時代對古典學術的偏見。他的努力未必足以力挽時代狂瀾，但對其個人的學術成長卻有重要意義，如他日後的回顧：「某種哲學精神的曙光，照亮了我對歷史與人文研究所做的概括性觀察。」[114]這本小書除了論戰目的外，也對「古典考證」與「歷史研究」的方法進行深入的討論，從其中可以看到青年吉朋在「古典學術」與「歷史研究」方面的敏銳觀察。吉朋後來投入《衰亡史》的寫作，其方法基礎似乎已在此時奠基。

---

in decimum librum Diogenis Laertii, qui est de vita, moribus, placitisque Epicuri (1649) 與逝世後才出版的 *Syntagma philosophicum* (1658)；萊布尼茲則在 1670 年代曾接受法國王室的委任，編訂卡培拉的著作，以作為法國皇太子的數學教本。

112 Edward Gibbon, *An Essay on the Study of Literature*, pp. 14-15.

113 Edward Gibbon, *An Essay on the Study of Literature*, pp. 12-13.

114 Edward Gibbon, *Autobiography*, p. 101.

臺灣大學學術期刊資料庫

三、吉朋與古典研究傳統

吉朋是在洛桑期間開始接受正規的古典學術訓練，之後持續保持對古典學術的興趣，並隨時注意古典研究的動態。他通常會參照近代學者的註釋來閱讀古典文本，以求確實瞭解；耳濡目染下，他學會了一些文字考訂的方法，並曾嘗試實際的考訂練習。

1758 年，吉朋在撰寫《論文學研究》時曾參考古今批評家的說法，提出一套「批評」（criticism）理論，「批評乃是對作品與作者作出評斷的一種技藝：評斷其所言是否正確；其所言是否適當；其所言是否屬實」。文本批評涵蓋三類工作：第一類需要文法、語言、手稿的知識、要能區辨假定的與真實的表現、或讓訛誤的文句恢復原意，是「文法家」的工作；第二類包含全部演說術與詩藝理論，屬於「修辭家」的專長；第三種是探究事實的情境與真相，乃是「歷史家」的職事。[115]這三種不同性質的批評工作，吉朋都嘗試練習過。

吉朋在年輕時實際練習過文字考訂工作。他在《自傳》中提到，早年讀羅馬史家李維的史著時，曾遇到一些文句上的難題，而嘗試進行考訂。1756 年 8 月，他研讀李維《羅馬史》，進行到第 3 卷 44 節時，讀到迦太基戰敗後與羅馬簽訂亡國條約之時，迦太基的落難英雄漢尼巴（Hannibal, 247-183/2 B.C.）對子民發表的一篇演說，對演說詞中的一句話感到困惑：

> 瀏覽李維《羅馬史》（第 3 卷 44 節）時，我被漢尼巴一篇演說中的一句話打住，無論如何強解，這句話與他的性格或言論都難以調和。對此，歷來註釋家們或假裝沒看見，或坦承其疑惑。我不經意發現，只需改動一個字母，亦即把“*odio*”改為“*otio*”，文意即豁然貫通。[116]

115 Edward Gibbon, *An Essay on the Study of Literature*, pp. 46-47.

116 Edward Gibbon, *Autobiography*, p. 78.

臺灣大學學術期刊資料庫

吉朋讀到的李維原文是：“Nec esse in vos *odio* vestro consultum ab Romanis credatis.” 意思是：「不要相信，羅馬人〔當他們剝奪你們的武力，並禁止你們對外國戰爭時〕意在藉此促進你們的苦難（*odio*）。」這段文字前後文意無法連貫，歷來古典學者都不得其解。但吉朋發覺只要將其訂正為 “Nec esse in vos *otio* vestro consultum ab Romanis credatis”，意即「不要相信，羅馬人〔當他們剝奪你們的武力，並禁止你們對外國戰爭時〕意在藉此促進你們的安寧（*otio*）」，則整個文意就完整、豁然貫通了。[117]

年輕的吉朋完美地解決了一個陳年的古典問題，不禁對自己的學術功力感到自豪。他希望這個發現能夠得到較客觀的學術認定，在年輕人的虛榮心驅使下，就寫一封信向法國巴黎大學教授克雷維業請教。克雷維業是「古典學者羅林（Charles Rollin, 1661-1741）的門生，出版過一部有價值的李維全集」，他「快速、有禮貌地回了一封信，稱讚我的聰慧，且接受我的臆測」。[118]吉朋的考訂後來得到學界的認可與接納，現代拉丁文版的李維《羅馬史》即依此發現訂正。

吉朋雖然練習過「文本考訂」的實務，具備成為批評家的潛力，但他在少年時期就對自己是否適於從事純語言的研究有所質疑，曾說：「即使我精通希臘文和拉丁文，仍必須以英文來闡釋原典的思想，這種即興式的理解必比不上專家學者的精緻翻譯。」[119]相對地，他對「歷史考證」之學就顯得更有自信。吉朋對如何正確詮釋古典作品，有一套言之成理的理論：古典作品必須放回其產生的歷史背景或脈絡，其真正的涵義才能解讀。他解釋說：

> 吾人處在不同地方，在不同時代，若不能把自己放在與希臘人與羅

117 這個文句的譯文乃參考克雷維業的解釋，參見 Edward Gibbon, “M. Crevier to Mr. Gibbon, 7th August, 1756,” in *The Miscellaneous Works*, vol. 1, pp. 434-435 n.

118 Edward Gibbon, *Autobiography*, pp. 78-79. 吉朋的原信已軼失，克雷維業的回信收入吉朋文集，見 Edward Gibbon, *The Miscellaneous Works*, vol. 1, pp. 433-435.

119 Edward Gibbon, *Autobiography*, pp. 31-32.

臺灣大學學術期刊資料庫

> 馬人的相同視界，必然看不到那種種的美。唯有對其情境與習尚擁有詳盡的知識，才能致此。從某些評註蒐羅到的皮毛概念與貧乏知識，僅能協助吾人捕捉到比較淺顯、表面的美：吾人會錯過其作品中所有的雅緻、所有的優美。……對古代的熟悉，乃是對古人著作唯一真正的註釋。[120]

只有熟悉古代歷史，培養一種設身處地的態度，才能以古人的眼光來看待古典，掌握古典的真意。「我們若對羅馬人的歷史、政治與宗教，古義大利的地理，奧古斯都的性格，及他跟元老院與人民間的特殊關係等，缺乏完整的知識，就不可能瞭解味吉爾作品的旨意、技巧及其實際的美感。」[121]

吉朋曾以這種態度來詮釋拉丁詩人味吉爾田園詩的寓意。味吉爾是奧古斯都時代的詩人，其著名的《農事詩》（*Georgics*）極力歌詠義大利鄉村生活的優美，讀之易在人們心中激起一種愉快的感受。但吉朋主張這並不是一篇尋常的抒情詩，因「詩人胸中懷有一個同樣尊貴、崇高的意圖」。[122]味吉爾的詩篇有何寓意？吾人須回歸奧古斯都時代的歷史情境，才能獲得恰當的解讀。

西元前 31 年，奧古斯都在內戰中獲勝後，面臨艱巨的國家重建工作，尤其是軍隊的復員問題。在長期內戰期間，羅馬軍隊人數大增；如今國家已回復和平，一些軍隊必須復員歸農，以減輕政府養兵的負擔。但是，羅馬軍人已經習慣於行伍的生活，如何讓他們再適應、接受農村的靜態生活，是一項棘手的工作。吉朋指出，在西元前 80 年，蘇拉（Sulla, c. 138-78 B.C.）掌權時曾有過發放土地給退伍軍人，希望戰士歸農，卻完全失敗的先例：「這批戰士……很快就對靜態的生活感到厭倦，不屑於以汗水賺取只要流點血就可以獲得的生活。他們隨即揮霍掉新得的地產，而眼見除了一場內戰之外不能指望重獲財富，他們立即強

120 Edward Gibbon, *An Essay on the Study of Literature*, pp. 25-26.

121 Edward Gibbon, *An Essay on the Study of Literature*, pp. 30-31.

122 Edward Gibbon, *An Essay on the Study of Literature*, p. 35.

臺灣大學學術期刊資料庫

力捲入卡提連（Catiline）密謀中。」[123]奧古斯都在戰後面臨到類似的困境，他要如何才能說服戰士們解甲歸農，而可不重蹈蘇拉的覆轍呢？

這位皇帝想到了他的友人味吉爾，希望能運用這位詩人「和諧的抒情詩，讓這群不遜的軍人甘心安於新環境」。經過長期的內戰，羅馬農村受到嚴重的破壞，鄉民生活絕非一幅詩情畫意的景象。但味吉爾創作《農事詩》，極力歌詠「平和的鄉民種種純真的快樂」，目的不是在教導士兵們基本農事，而是刻意地「經過計算」，欲以「感人的描述」激發士兵去領會鄉村生活的美好。[124]就此而論，吉朋結論說，味吉爾不能再被視為描述鄉野生活的一般作家，而是「另一個奧菲斯（Orpheus），創作這抒情詩只是為了去除這群野蠻人的兇狠性格，使其結合在和諧的社會紐帶之中」。[125]奧菲斯是希臘神話人物，乃謬思之子、豎琴的高手，據說其琴聲高妙，可以迷住野獸，甚至感動木、石。在神話中，他隨阿果斯（Argos）城邦的英雄出征，曾以優美歌聲吸引住阿果斯的英雄，抗拒了女妖賽倫（Siren）美妙歌聲的誘惑。[126]吉朋把味吉爾的詩篇比作是奧菲斯的琴聲，意欲吸引戰士歸田，脫離戰爭的誘惑。

吉朋還以類似的方法為羅馬史家波力比烏斯（Polybius, c. 200-c. 118 B.C.）的可信度進行辯護。波力比烏斯《歷史》（*History*）卷 3 第 22 節載有羅馬與迦太基間的第一次締約，並詳細地交代條約內容。[127]波力比烏斯記述的條約有幾個疑點，令歷史家感到困惑。其一，他說條約是在羅馬推翻王政後魯西烏斯．布魯塔斯（Lucius Junius Brutus）與馬可仕．霍拉西烏斯（Marcus Horatius）擔任首任執政之年（509-508 B.C.）簽定，但霍拉西烏斯是在布魯塔斯死後才擔任執政。其二，條約中稱安迪亞

123 Edward Gibbon, *An Essay on the Study of Literature*, pp. 39-40.

124 Edward Gibbon, *An Essay on the Study of Literature*, pp. 41-42.

125 Edward Gibbon, *An Essay on the study of Literature*, p. 44.

126 有關奧菲斯的故事，參見 M. C. Howatson & Ian Chilvers, eds., *Oxford Concise Companion to Classical Literature*, pp. 385-386, 497, “Orpheus” and “Sirens” 條。

127 關於這個條約的內容，見 W. R. Paton, trans., *Polybius: The Histories* (The Loeb Classical Library; Chicago: University of Chicago Press, 2012), book 3, c. 22.

臺灣大學學術期刊資料庫

（Ardea）、安提姆（Antium）和泰拉辛尼亞（Terracinia）等族是羅馬「屬民」（波力比烏斯原文作 “Latinis qui sub ditione erunt”[128]），實際上三者當時只是「盟邦」（socii）而已。其三，條約提到羅馬的海軍，但羅馬要到第一次布匿克戰爭（First Punic War, 264-241 B.C.）時，即布魯塔斯擔任執政後 250 年，才開始建造戰艦，成立艦隊。[129]

法國歷史懷疑論者波福（Louis de Beaufort, 1703-1795）曾經拿這些矛盾來否定這個條約的真實性，甚至進而全面質疑羅馬早期歷史的真確性。[130]但是，吉朋相信這個條約的真本當時確實是典藏在羅馬，波力比烏斯的敘述應是有所本。果若如此，則上述矛盾應如何解釋？針對這些問題，吉朋應用了批評的藝術，透過文本或歷史的考證來討論波力比烏斯所敘述條約的真假問題，以回應波福的質疑。

關於第一個問題，吉朋主張羅馬與迦太基的「締約日期」與「條約內容」應分開討論。他堅持此條約締約年代與布魯塔斯擔任執政時間相吻合，而條約內容則接近波力比烏斯所述。吉朋引證史家李維之說，指出羅馬與外國締結正式條約（foedera）時，係由祭司團（feciales）兩名祭司祝聖並簽字，而非由執政。[131]波力比烏斯此處引述者並非條約的原件，而是當時的古史專家的傳譯本。[132]但古史專家在解讀這個文件時，吉朋推測，並未考訂清楚事實，率爾認定兩位簽字者是羅馬執政，並以為就是布魯塔斯和霍拉西烏斯，因兩人是同代的羅馬政要，儘管後者當

128 見 Polybius, *Historiarium libri qui supersunt. J. Gronovius emendavit.* Gr. And Lat. (Amsterdam, 1670), vol. 1, book 3, p. 246. 吉朋的藏書目錄中有此一希臘文與拉丁文對照本，見 Geoffrey Keynes, *The Library of Edward Gibbon*, Second Edition, p. 227. 他在此處使用的有可能即是這個版本。

129 Edward Gibbon, *An Essay on the Study of Literature*, p. 53.

130 Louis de Beaufort, *Dissertation sur l'Incertitude des cinq premiers Siecles de l'Histoire Romaine* (Utrecht, 1738-1750).

131 Livy, *History of Rome* (London: J. M. Dent & Sons, 1926), book 9, c. 5.

132 波力比烏斯在書中指出，條約原件是以古拉丁文寫成，而「古拉丁文與近代拉丁文相去甚遠，雖經過專家多方努力，也僅能部分地弄清楚」。因此，波力比烏斯也只是「盡我所能儘量將其翻譯得精確」。W. R. Paton, trans., *Polybius: The Histories*, book 3, c. 22.

臺灣大學學術期刊資料庫

時尚非執政。[133]關於第二個問題：安迪亞、安提姆和泰拉辛尼亞三個民族在簽約時僅是羅馬的「盟邦」，何以波力比烏斯在條約中卻稱之「屬民」？吉朋主張布魯塔斯執政時，三者名義上雖是羅馬「盟邦」，實質上是「屬民」。他推測當時羅馬人刻意讓三邦保持「盟邦」的名義，使其心理上較願意接受羅馬的控制。但三邦須提供軍隊給羅馬，換來的僅是羅馬的保護，待遇實與屬民無異。「這些人群的確稱為羅馬盟邦，但很快就發現自己不過是奴隸而已」，古史家在傳譯這個條約時，只是直接道出「事實」，而不管其「名義」。波力比烏斯誤引了這樣的傳譯，竟把這樣的「事實」當作「名義」寫入條約裡。[134]至於羅馬「海軍」問題，波力比烏斯確實有自相矛盾處。他在《歷史》卷 1 第 20 節提到執政第里烏斯（Gaius Duillius, 西元前 3 世紀）指揮羅馬第一支艦隊。既如此，這條約何以提到西元前 6 世紀羅馬與其盟邦有海軍？吉朋的解釋是：王政時期，國王塔昆（Tarquin）實行暴政，臣民與軍隊不堪壓迫，於是「裝備小船出海活動。新生的共和給予保護，但也以這條約來約束其海盜活動」。吉朋認為波力比烏斯這裡提到的羅馬海軍，事實上不過是一支簡陋的民間海上武力，並非真正的海軍。波力比烏斯「以過於模糊、籠統的措辭來敘述」，讓人誤以為羅馬此時已有海軍了。[135]

以上三個個案顯示，無論是文法的、修辭的或歷史的批評或考證，吉朋都有能力從事。不過，吉朋本人一直不曾正式投入專業的古典考證工作，而只是保持一種紳士的業餘精神，優游於古典學術的趣味之中。不過，他對當世的古典學術有他的一套評價。據他觀察，藝文學界與科學界一樣龐雜多元、優劣混雜：「如果科學界有它的卜封們（Buffons），它也有……它的博學者、它的學究們。」[136]古典學界更是如此。吉朋經

133 Edward Gibbon, *An Essay on the Study of Literature*, pp. 54-55.

134 Edward Gibbon, *An Essay on the Study of Literature*, pp. 56-57. 歷史上，拉丁文曾經歷長期的變化。在波力比烏斯時代，史家已經無法掌握古拉丁文了，故需要靠當時一些「古史專家」的傳譯。

135 Edward Gibbon, *An Essay on the Study of Literature*, pp. 59-60.

136 Edward Gibbon, *An Essay on the Study of Literature*, p. 77.

臺灣大學學術期刊資料庫

常論斷古典學者之優劣，從其論斷可看出他心中理想古典學者的條件。

吉朋主張，任何學問——無論文學或科學都必須建立在「推理」與「事實」兩個基礎上。「沒有後者，我們的研究對象是虛幻的；缺乏前者，則最科學的成果將是不明的與非理性的。」[137]優秀的批評家除了學問必須淹博，還要具備一顆清晰的頭腦、一種好的品味與敏銳的透視力：

> 跟隨文人進入他的書房，你會發現四壁環繞著各時代的文學著作；他的圖書館擺滿這類收藏；他因博覽群籍，心智獲取許多訊息，卻又不致負擔過多。他環顧四周圖書，絕不放過任何與其探討的主題即便只有一絲關聯性的作者。他可能碰巧讀到一些偶然、醒目的文句，並拿來證實批評家的發現，或戳穿其假設。而在這裡，學者（scholar）的工作即告結束。[138]

一般讀者的眼光短淺，錯以為古典學者的工作即盡於此，並仰慕註疏家的博聞強記。但是博聞強記在吉朋看來只是治學的基礎功夫，視之為問學終極目標不啻是「將建築材料誤認為是建築物本身」。實際上，這個時候「真正的批評家覺得其工作才要開始」；而在工作過程中，他必須「討論、比較、沉澱、再決斷」，並應「客觀、嚴謹，只服膺理性或事實的權威」。吉朋繼續說明批評家應具的美德：

> 真正的批評家有豐富的資料隨時待命，但不會錯誤的羅織；他不敢不讓最閃亮似真的假設屈服於真理之下，也不敢以僅是臆測的語言對大師們高談闊論。作為一個公開宣稱支持真理者，他會致力尋找與其研究主題相干的證據，並且得到滿意的解答。……他虛心與明理，不會把臆測拿出來當作真理、推理當作事實、可能當作明證。[139]

在這裡，他為「好批評家」的標準下了清晰的定義。

臺灣大學學術期刊資料庫

137 Edward Gibbon, *An Essay on the Study of Literature*, p. 77.

138 Edward Gibbon, *An Essay on the Study of Literature*, pp. 48-49.

139 Edward Gibbon, *An Essay on the Study of Literature*, pp. 49-50.

16 世紀以降，歐洲古典學術鼎盛，古典學者輩出，但水準不一，識見、學問與文章高下有別。吉朋經常月旦近代古典學者的學問，區分何者是真正的「古典學者」（Scholar）？何者純粹只是一介「訓詁考據家」（Scholiast）？

1762 年，吉朋研究荷蘭學者布爾曼（Pieter Burman, 1668-1741）考訂的羅馬修辭家坤體良（Marcus Fabius Quintilianus, 約生於A.D. 35）著作時，在貝爾（Pierre Bayle, 1647-1706）的《批評的與歷史的辭典》（*Dictionnaire historique et critique*）中找到一篇布爾曼寫的〈導言〉。他在讀後評論：「布爾曼頂多是一個批評家，而且（在我看來）並不是好的批評家；因為一個好批評家必須做好推理的工作，而布爾曼卻完全無法推理。」[140]相較之下，英國學者道威爾（Henry Dodwell, 1641-1711）就比較博學與精確，他編的《坤體良時代編年史》（*Annales Quintilianei*）學問確實淹博：在處理羅馬帝國前期史時，道威爾「連最細微的史實或史料也不放過；他運用這些史實或資料的技巧，同其學問一樣出色」。不過，吉朋對道威爾的研究方法和寫作風格頗有微詞：「這位作者最差的部分是其方法和文章風格；前者混亂到無法想像，後者又受忽視到野蠻程度。」[141] 1762 年 9 月，吉朋讀希臘修辭家龍津納斯（Cassius Longinus, c. 213-273）的經典《論崇高》（*On the Sublime*）。他參考龍津納斯三個批評家的評論，作了這樣的比較與評斷：「藍貝尼烏斯（Gerard Langbaenius, 1656-1692，英格蘭學者）極端炫學，賣弄學問到荒謬的程度；勒費弗（Tanneguy Le Fèvre, 1615-1672，法國學者）如往常一樣，自負、大膽而機巧；托立烏斯（Jacobus Tollius, 1633-1696，荷蘭學者）的註釋則處處展現識見、堅實的批評與真正的博學。」[142]

吉朋期待的是有思想、富識見、具方法的古典學者，而非流於瑣碎、枯燥考訂的考據家。他歷數近代歐洲古典學者的學術，指出：

臺灣大學學術期刊資料庫

140 D. M. Low, ed., *Gibbon's Journal*, p. 81.

141 D. M. Low, ed., *Gibbon's Journal*, pp. 81-82.

142 D. M. Low, ed., *Gibbon's Journal*, p. 173.

> 伊拉斯莫士（Desiderius Erasmus, 1466-1536）敏銳、多方的機智；卡紹本與弗西烏斯（Gerard Vossius, 1577-1649）的精確；利比西烏斯的敏捷；勒費弗的高雅與細緻；班特利（Richard Bentley, 1662-1742）銳利的洞察；麥休（Guillaume Massieu, 1665-1722）與法拉奎葉（Claude François Fraguier, 1660-1728）溫文的風格；沙利葉（Claude Sallier, 1685-1761）紮實、原創的考證；勒克拉克與福列瑞深邃的哲學精神。[143]

在吉朋的眼中，這些都是真正的、學思兼具的古典學者，不能與葛路特（Janus Gruter, 1560-1627）、撒爾馬修（Claudius Salmasius, 1588-1653）、馬森（Jean Papire Masson, 1544-1611）之類「不折不扣的編纂家」混為一談。後一批學者的著作雖然不無用處，卻「鮮能滿足讀者的品味，無法引人喜愛」。[144]

「好學深思」或「枯燥瑣碎」乃是吉朋心目中古典學者優劣的判準：伊拉斯莫士、卡紹本、弗休斯等都是好學深思的學者，而撒爾馬修、葛路特與馬森等則不過是枯燥瑣碎的學究。然而，古典學者何以有如此差別？吉朋相信，關鍵出在讀書、問學的方法。比較撒爾馬修與葛羅修斯兩位荷蘭學者的治學，他發現撒爾馬修雖然書讀得同葛羅修斯一樣多，或許還讀得更多，但「不同的讀書方式卻使一個變成啟蒙的哲學家，另一位明言之卻成為一個塞滿無用學問的學究」。[145]

吉朋在寫作《衰亡史》時，經常引用近代古典學者的研究成果，但時而忍不住要在註釋中對學究型的古典學者批評、嘲弄一番。他發現很多學者有考據癖，遇到任何事物都想要考據一過。例如，《衰亡史》第 11 章敘述西元 275 年執政官塔西陀（Tacitus, 275-276 在位）蒙元老院推舉為皇帝後，曾經恢復元老院的一些古老特權，包括監管國家財政的權

臺灣大學學術期刊資料庫

143 Edward Gibbon, *An Essay on the Study of Literature*, p. 16.

144 Edward Gibbon, *An Essay on the Study of Literature*, pp. 16-17

145 Edward Gibbon, “Extraits Raisonnes de mes Lectures,” in *The Miscellaneous Works*, vol. 5, p. 209.

力。[146]關於後者，吉朋引用《羅馬皇帝傳》（*Historia Augusta*）的敘述，來說明元老院在皇帝奧瑞連（Aurelian, 270-275 在位）時保有一定的財政權。根據《羅馬皇帝傳》，奧瑞連曾對元老院明白表示：“Est praeterea vestrae auctoritatis arca publica.”（意即「此外，國家的財庫也在您們的控制之下。」）[147]吉朋發現在拉丁文本《羅馬皇帝傳》中，「這個句子十分清楚，然而卡紹本和撒爾馬修卻都試圖予以訂正」。[148]這種癖好形成一種為考證而考證的惡習，白花力氣去考訂一些實際上毋需考訂的文字。有些學者喜歡畫蛇添足，把一些原本明白不過的事實考證得更不清楚：「有關這些羅馬運動會舉行的時間，史卡利格、撒爾馬修和丘柏（Cuper），卻幫自己找了大麻煩，去搞混一個原本非常清楚的主題。」[149]更有一些學者目光如豆，專作一些無關緊要的考證。史卡利格和撒爾馬修兩人曾對義大利南部最早希臘殖民地「丘瑁」（Cumae）的起源問題爭論不休。吉朋認為這個爭論毫無意義：「我留交史卡利格和撒爾馬修兩人去爭論丘瑁的起源問題吧！這個希臘人在義大利建立的最早殖民地，早在詩人朱文諾時就已杳無人煙，現在更只是廢墟一片。」[150]在他看來，一個早在西元 2 世紀即已荒廢的希臘殖民地實無重要性，更不具學術討論的價值。

近代古典學者的缺點不止於此。有些學者在須作註釋時不作註釋，卻在不須作註釋之處堆滿了評註。吉朋為瞭解古羅馬的歷史地理，研讀了羅馬詩人納馬提安（Claudius Rutilius Numatianus, 生於 4 世紀末）的

146 Edward Gibbon, *The History of the Decline and Fall of the Roman Empire* (London: Methuen & CO., 1905), vol. 1, p. 322.

147 拉丁引文見 Flavius Vopiscus, “Aurelianus,” in *Historia Augusta*, ed. David Magie (Loeb Classical Library; London & Harvard, 1932), xxvi, 20.

148 Edward Gibbon, *The History of the Decline and Fall of the Roman Empire*, vol. 1, p. 322, n. 15.

149 Edward Gibbon, *The History of the Decline and Fall of the Roman Empire*, vol. 1, p. 346, n. 106.

150 Edward Gibbon, *The History of the Decline and Fall of the Roman Empire*, vol. 4, p. 419, n. 75.

臺灣大學學術期刊資料庫

《返鄉詩》（*Itineraria*），使用前述荷蘭古典學者布爾曼編訂的《小拉丁詩彙編》（*Poetae Latini Minores*）版。他在閱讀中抱怨說：

> 這個版本裡，本文陷在一堆黑壓壓的評註裡，好不容易才露現出來。納馬提安的 700 行詩，竟散佈在 200 多頁的四開紙上。頁頁擠滿了希姆勒（Josias Simler, 1530-1576）、卡斯特里歐（Sebastian Castelio, 1515-1563）、畢帖烏斯（Petrus Pithaeus, 1539-1596）、西茲曼納斯（Theodorus Sitzmannus, ?-1623）、巴提烏斯（Caspar Barthius, 1587-1658）等人的評註。[151]

「然而」，吉朋認為，「納馬提安絕不是個難懂的作者；只有一、二處地方，我應會樂意看到註釋，但卻偏找不著。不過，我太瞭解這些註釋家了，因而對這樣的失望一點不感到意外」。[152]更有學者頭腦不清，胡亂進行考證，以致把詩人的「隱喻」用語當作是「事實」，也拿來考證一番。法國學者杜波（Jean-Baptiste Dubos, 1670-1742）在《古代詩歌與繪畫考證》（*Réflexions critiques sur la poësie et sur la peinture*）中，考訂 5 世紀詩人克勞迪安（Claudius Claudianus, d. 404）的詩作時，即是如此。克勞迪安在一首拉丁詩中描寫古代高盧牧人在易北河一帶放牧的情景，意在形容高盧邊境的和平與繁榮。但是

> 杜波居然認為 “Albis” 應是 “Alba”（亞登山麓的一條無名小溪）之誤，並詳細解釋理由：在易北河（Elbe）以東地區放牧高盧牛群，乃是一件危險的事。真夠愚蠢！詩中的地理，易北河與賀辛尼安森林（Hercynian Forest）可象徵日耳曼境內的任何一條河或任何一個林地。克勞迪安還沒有準備接受我們的考古家的嚴格考究呢！[153]

吉朋對這類古典學者無所不在、毫無徵別的考證甚感無奈，諷刺說：「歐

臺灣大學學術期刊資料庫

151 Edward Gibbon, “Extraits de Mon Journal,” in *The Miscellaneous Works*, vol. 5, p. 435.

152 Edward Gibbon, “Extraits de Mon Journal,” in *The Miscellaneous Works*, vol. 5, pp. 435-436.

153 Edward Gibbon, *The History of the Decline and Fall of the Roman Empire*, vol. 3, p. 270, n. 91. Hercynian Forest 在古代萊茵河以東的南德一帶，西邊與 Black Forest 為鄰。

洲的好奇精神多努力在探索最晦暗與最古遠的古代史啊！」[154]

1762 年 4 月，吉朋讀到荷馬史詩《伊里亞得》（*Iliad*）第 23 卷時，有感而發地對近代古典學家的弊病不客氣的批評。荷馬在這卷中，敘述特洛伊（Troy）戰爭中希臘英雄巴湊克魯斯（Patroclus）的葬禮中舉行的體育競賽，行文清晰而傳神地描述了許多古希臘公共與宗教習俗。在吉朋眼中，這已然是「一幅有關英雄時代習尚的最佳圖像」，毋須勞煩近代古典學者再多作考證：

> 我愈閱讀古人的著作，就愈相信古人的原著是吾人最佳的註釋家。例如這一篇有關古代體育的文章，當我仔細研讀荷馬、包杉尼亞斯（Pausanias, 活躍於A.D. 160 前後）及更多古人的著作時，發現布瑞（Pierre-Jean Burette, 1655-1747）能教我的地方不多，或許除了他從一些名不見經傳的辭典編纂家文句中撿起的東西之外。不過，我這麼說，並不是要否定現代批評家的用處，而是要防範其流弊。[155]

實際上，吉朋觀察到許多古典學者的學術成就名不符實。以撒爾馬修為例，他指出，這位荷蘭學者的聲望主要來自瑞典女王克里絲緹娜（Christina, 1632-1654 在位）的尊崇：「這位女主不僅自己研究古典，且獎賞古典註疏家。就是由於她，撒爾馬修被授以崇高的尊榮。」但吉朋卻認為他的學術其實是名過其實，絕非古典學者的典範：「這位女主對這些學者過度尊崇。在我看來，我雖然有時候是他們的擁護者，但從來不是他們的黨羽。我坦白說，他們的治學方法太粗糙，他們的著作流於瑣細、枝節。學究式的博學堵塞了他們的想像空間。」在吉朋眼裡，撒爾馬修這類的學者「毋寧是乏味的編纂家，而不是明智的古典學者」。[156]

臺灣大學學術期刊資料庫

154 Edward Gibbon, *The History of the Decline and Fall of the Roman Empire*, vol. 5, p. 404, n. 19.

155 D. M. Low, ed., *Gibbon's Journa*l, p. 113.

156 Edward Gibbon, *An Essay on the Study of Literature*, pp. 8-9.

四、吉朋與古物研究運動

文藝復興以來，歐洲古物研究運動發掘了豐富的古物資料，累積了許多傳統史料遺漏的古史知識，然而史家普遍尚不認識這類史料對歷史書寫的用處。在 18 世紀史家中，吉朋是少數認知到「古代史跡」對歷史研究的功用、瞭解古物研究運動對史學發展的意義的史家。

（一）古物研究的興趣

吉朋自幼即對地理、地圖、年表之類的古史知識有濃厚興趣。他在《自傳》中提到，他進牛津大學讀書前那個暑假（1751 年），曾作過一個小小的學術探索，認識了一些古物研究知識：「解拉瑞斯（Christoph Cellarius, 1638-1707）和威爾斯（Edward Wells, 1667-1727）的古地圖，在我心中印下古代地理圖像；從史川求斯（Johannes Stranchius）我學到年代學的要素；賀維克斯（Christoph Helvicus, 1581-1617）和桑德森（Sanderson）的年表，與鄔舍（James Ussher, 1581-1656）和普瑞都（Humphrey Prideaux, 1648-1724）的編年，顯示了事件之間的關連，並把一大堆人名與日期刻畫在一個清晰、易記的系列之中。」[157] 1752 年夏天，吉朋回鄉渡暑假時，更決定寫一本書《賽索斯崔斯王時代》（*The Age of Sesostris*），嘗試探討這位古埃及的「亞洲征服者」的年代。

157 Edward Gibbon, *Autobiography*, p. 33. 吉朋閱讀的可能是：解拉瑞斯（日耳曼古典學者）寫的 *Geographia Antiqua*；威爾斯（英格蘭數學家與地理學家）編的 *A New Set of Maps both of Ancient and Present Geography* (1704)；史川求斯（日耳曼的年代學家）著的 *Chronology*；鄔舍（愛爾蘭的 Armagh 大主教）著的 *Annals of the World* (1658)；普瑞都（英格蘭教會教士、東方學家）著的 *The Old and New Testament Connected in the History of the Jews and Neighbouring Nations*（1715-1717，部分取材自鄔舍前書）；賀維克斯（日耳曼年表學與歷史學家）所著 *Theatrum historicum et chronologicum* (1609)，英譯本 *The Historical and Chronological Theatre of Christopher Helvicus, Distributed into Equal Intervals of Tens, Fifties, and Hundreds: With an Assignation of Empires, Kingdoms, Governments* (1687).

臺灣人文學術期刊資料庫

根據其《自傳》，吉朋當時曾研讀 17 世紀英格蘭年表學家馬歇姆爵士（Sir John Marsham, 1602-1685）的《大年表》（*Chronicus Canon Agypticus, Ebraicus, Gracus, et disquisitions*, London, 1672），試圖依此書所述進行探索。他根據馬歇姆的年表推斷賽索斯崔斯的年代應在西元前 10 世紀，大約與以色列所羅門王同代。但這個推斷與古埃及史家曼尼托（Manetho）之說不符。曼尼托是西元前 3 世紀托勒密王朝的埃及史家，寫有一部《聖書》（*Sacred Book*）與《埃及史》（*Aegypticaca*）。在《聖書》中，吉朋發現，曼尼托主張賽索斯崔斯乃是傳說中埃及王達瑙斯（Danaus）的兄長，而達瑙斯在西元前 1510 年渡海占領希臘。依此，賽索斯崔斯應是西元前 16 世紀的法老，比吉朋認定的年代早六百年。此一矛盾要如何解決？根據他的判斷，曼尼托曾把《埃及史》獻給托勒密二世（Ptolemy II Philadelphus, 285-246 B.C.），他在《聖書》中的陳述是為了曲意奉承這位統治者的旨意，並不可靠。托勒密二世意圖將家世上溯至賀丘里斯（Hercules）家族的馬其頓王朝，而達瑙斯則是賀丘里斯族的祖先。當達瑙斯的兄長賽索斯崔斯一系絕嗣後，作為其後代的托勒密家族遂為埃及王室的唯一代表，而可宣稱他們對其征服而來的王國保有合法繼承權。[158]少年吉朋提出一個他自認「尚稱巧妙」的解釋。

吉朋是在洛桑求學後期才真正接觸到「古物研究」學問，《皇家銘刻與藝文學院集刊》是其主要知識來源。[159]透過此刊物，吉朋接觸到歐洲古物學界的重要學者與論著。法國古物研究的健將，如羅馬史家布里帖利（Abbe de la Bleterie, 1697-1772）、近東銘文專家巴特勒密、銘刻學院秘書布干維爾（Jean-Pierre de Bougainville, 1722-1763）、凱勒斯、拉丁古典與法國古史家卡容尼葉（Jean Caperonnier, 1716-1775）、法國古史家封斯曼（M. de Foncemagne, 1694-1779）、東方史與匈奴史專家狄基內（Joseph de Guignes, 1721-1800）與虎克（Abbe Hook）、古典學者暨法國古史家聖巴拉易（La Curne de St. Palaye, 1697-1781）等，都是他

158 Edward Gibbon, *Autobiography*, pp. 43-44.

159 Edward Gibbon, *Autobiography*, p. 93.

臺灣大學術期刊資料庫

素所熟悉、甚至認識的學者。[160]

從 1763 年 5 月到 1764 年 4 月間，吉朋在大旅遊（Grand Tour）途中重遊洛桑，停留了一年。在這段期間，吉朋為了造訪「永恆之城」預作準備，致力收集、閱讀古代羅馬與義大利的資料，特別是歷史地理方面的知識。在這方面，他有計畫地研讀了納地尼（Famiano Nardini, d. 1661）與克魯維瑞烏斯（Philipp Kluwer Cluverius, 1580-1623）兩人關於古羅馬與古義大利地誌著作。

根據「日誌」，在 1763 年 9 月，吉朋研讀義大利古物學家納地尼的《羅馬古史蹟》（*Roma antica*, 1666）。[161]納地尼對諸多古羅馬課題的處理，「極為博學、論斷中肯、詳細精確，雖偶爾失之煩冗，但一般而言富啟發性」。[162]從 9 月 7 日到 10 月 2 日，吉朋花了十六天的時間專注、用心地研讀。他稱讚這一部書的博學、論斷與精確，認為後代學者能再增添的空間不多，但他也批評納地尼「或許太過冗長，有時欠明晰」，指責他「提出許多難題，和花了數頁去討論一個只須恰當、清楚的觀察即可解決之處」。[163]

接著在 10 月 13 日到 12 月 3 日，吉朋詳讀古典學者克魯維瑞烏斯編寫的《義大利古史蹟》（*Italia Antiqua*, Leyden, 1624）。在這部書中，作者首先說明義大利的各種名稱及疆域、土地、氣候、居民與語言等資料，再逐一介紹各個地區的歷史地理，從利古里亞海岸（Liguria）、亞德里亞沿岸（Adriatic coast）、伊斯特里亞（Istria）、阿爾卑斯山通道、塔斯坎尼（Tuscany）、盎布里亞（Umbria）、皮西納姆（Picenum）、拉丁平原（Latium）、康巴尼亞（Campania）、卡拉布利亞（Calabria）、

160 Robert Shackleton, “The Impact of French Literature on Gibbon,” *Daedalus* (Summer, 1976), pp. 42-43.

161 收入日耳曼古典學者格拉維烏斯（Johann Georg Graevius, 1632-1703）所編《羅馬古蹟集成》（*Thesaurus antiquitatum Romanarum*, 12 vols., 1694-1699）. Edward Gibbon, “Extraits de Mon Journal,” in *The Miscellaneous Works*, vol. 5, pp. 313-314.

162 Edward Gibbon, “Extraits de Mon Journal,” in *The Miscellaneous Works*, vol. 5, pp. 313-314.

163 Edward Gibbon, “Extraits de Mon Journal,” in *The Miscellaneous Works*, vol. 5, p. 343.

臺灣大學學術期刊資料庫

魯堪尼亞（Lucania）等等。吉朋認為這是一部「古代地理課題的寶庫，確實處理得很仔細，或許除了希臘與義大利之外，沒有其他國家值得這樣的處理」。[164]他指出本書的優點：

> 整部書中，權威出處都臚列出來，經過篩選，並互相比較；而比較的結果並非總是對他們有利。古人時常根據記憶引述。當時圖書稀少，地圖更少；在一個若無眼睛之助心智即容易飄忽的科學，訛誤難以避免。註釋家塞維烏斯經常遭到克魯維瑞烏斯的批評。在這裡，這一位冒牌的學者被拿掉了假博學的面具。[165]

克魯維瑞烏斯在作批評時，連古代的大師如托勒密（Ptolemy, c. 100-c. 178）、史特拉坡（Strabo, 64 B.C.-A.D. 24?）和普林尼等都不放過。不過，吉朋發現克魯維瑞烏斯本人其實也犯了時人太過迷信古代名師的毛病，常把古人的錯誤歸咎於傳抄之誤。他批評克魯維瑞烏斯的考訂「有許多嫌太大膽，有更多是貿然或無用」。而整部書「資料龐多、方法混亂、文體則是各個時代作者引文的一個雜燴」。[166]總體而言，吉朋讀完此書以後，仍自覺從中「取得許多有用的知識，將不易忘記」。[167]

關於羅馬古城地誌，吉朋還研讀了荷蘭學者弗西烏斯的《古羅馬城的規模》（*De antiquæ Romæ magnitudine*）與丹麥學者包瑞求斯（Olaus Borrichius, 1626-1690）的《羅馬古城》（*De Antiqua Facie Urbis Romae*）兩部著作。[168]他對古羅馬道路的歷史也極感興趣，讀了荷蘭學者威謝林（Petrus Wesseling, 1692-1764）編訂的《羅馬古道路》（*Vetera Romanorum itineraria*, 1735），稱讚此書是「有關羅馬帝國地理最有用的著作」。[169]此外，法國古典學者丹維爾的《古義大利道路測量》（*Mesures*

164 Edward Gibbon, “Extraits de Mon Journal,” in *The Miscellaneous Works*, vol. 5, pp. 356-357.

165 Edward Gibbon, “Extraits de Mon Journal,” in *The Miscellaneous Works*, vol. 5, p. 426.

166 Edward Gibbon, “Extraits de Mon Journal,” in *The Miscellaneous Works*, vol. 5, pp. 426-427.

167 Edward Gibbon, “Extraits de Mon Journal,” in *The Miscellaneous Works*, vol. 5, p. 426.

168 Edward Gibbon, “Extraits de Mon Journal,” in *The Miscellaneous Works*, vol. 5, pp. 344-350, 354-356. 這兩書都收入格拉維烏斯編的《羅馬古蹟集成》中。

169 Edward Gibbon, “Extraits de Mon Journal,” in *The Miscellaneous Works*, vol. 5, p. 293.

臺灣大學學術期刊資料庫

Itineraires）與古物學者柏吉爾（Nicolas Bergier, 1557-1623）的《羅馬帝國道路史》（*Histoire des grands Chemins de l'Empire Romain*）兩書也出現在讀書日誌之中。[170]這些都是後來吉朋在書寫《羅馬帝國衰亡史》時經常引述的著作。

研究歷史地理時，吉朋決定加入「古物」與「紋章」方面的研究。[171]他為此造訪洛桑的「紋章學院」（Academy of Medals）與公共圖書館。吉朋在洛桑圖書館接觸到文獻考證學，研究當代考證大師的經典：馬比揚的《古文書學》和孟福貢的《古文字學》。不過，吉朋並不是一個「真正」的學者，缺乏深入此一學問的熱情。他在後來承認自己雖研究過文獻考證的理論，卻從「未學到如何應用這門技藝」。[172]無論如何，文獻考證學卻也讓他認識到一個新的古史研究領域。

相對地，吉朋認真地研究過「古泉幣學」（numismatics）論著，後來也經常引用「紀念章」與「錢幣」上的史料來證史。1764 年 12 月，吉朋讀英國評論家約瑟夫．艾狄生（Joseph Addison, 1672-1719）的古物論著《論古代泉幣的用處》（*Dialogues upon the Usefulness of Ancient Medals*），以期瞭解「研究紋章之學能獲得的好處」。[173]艾狄生在書中的第一個對話指出：

> 確實，紋章可以大幅地照亮歷史，因其可以確定某些文句確實是出自古代作者，可以解決不同說法的爭議，也可以記錄下被忽略掉的事情。就此而言，一櫃子的紋章就是一部歷史。[174]

艾狄生更以歷史比羅懷疑論的論述，宣稱「古物」乃是比「文字資料」更可靠的史料。史家在書寫歷史時，他說：「徵引一個紋章遠比徵引一

170 Edward Gibbon, "Extraits de Mon Journal," in *The Miscellaneous Works*, vol. 5, pp. 332n, 336n.

171 Edward Gibbon, "Extraits de Mon Journal," in *The Miscellaneous Works*, vol. 5, p. 445.

172 Edward Gibbon, *Autobiography,* pp. 136-139.

173 Edward Gibbon, "Extraits de Mon Journal," in *The Miscellaneous Works*, vol. 5, pp. 455-456.

174 Joseph Addison, "Dialogues upon the Usefulness of Ancient Medals," in *The Works of Joseph Addison*, ed. Henry G. Bohn (London: George Bell & Sons, 1906), vol. 1, p. 203.

臺灣大學學術期刊資料庫

個作者可靠，因為如此，你不是訴諸一個蘇東尼烏斯或一個藍普瑞迪烏斯（Aelius Lampridius，按：《羅馬皇帝傳》的作者之一），而是直接訴諸皇帝本人，或整個羅馬元老院。」何況，文字史料容易遭到篡改、甚至偽造，但是「古幣上的文字或人物更無遭到抄書人和謄寫者篡改之虞」。[175]這些立論對吉朋應有所啟發。艾狄生之外，吉朋研究瑞士古物學家史班漢（Ezechiel Spanheim, 1629-1710）古物學名著《古泉幣研究》（*De Praestantia et Usu Numismatum*）。[176]「我更嚴肅地研讀史班漢的鉅著《古泉幣研究》，並與他同樣拿國王與皇帝們、家族與殖民地的紋章，來解說古代歷史。」[177]他讚揚這本書「是紋章之學的真正寶庫，此一學問的經典之作」。[178]在《衰亡史》的寫作過程中，紋章資料是吉朋最常應用的輔助學科，史班漢的著作更是他經常引用的專著。

跟古典考證一樣，古物研究學者的學術也有優劣、高下之別。吉朋閱讀古物研究論著時，經常評斷古物學家的功夫。例如，他曾比較法國考古學者凱勒斯的《論古畫》（*Dissertation upon ancient Painting*），與拉諾季（M. de la Nauze）的《普林尼論古畫》（*Memoir upon the Manner Pliny has treated of ancient Painting*），指出：

> 雖然凱勒斯名氣較高，但我自己應比較喜歡拉諾季。……拉諾季的著作很博學、嚴謹、有識見，雖然有時不夠精確。凱勒斯的考察則毫無章法、過於瑣細，而且若去除其學術包裝，有時顯得空洞。[179]

他很欣賞拉諾季的「博學」、「嚴謹」與「識見」，而不滿意凱勒斯的「毫無章法」與「過於瑣細」，這些批評語反映了吉朋本人的學術品味。他對拉諾季一直有很高的學術評價。1761 年 8 月 25 日，他在《皇家銘刻與藝文學院集刊》第 26 卷讀到拉諾季另一篇論文〈論古羅馬曆法〉，

175 Joseph Addison, "Dialogues upon the Usefulness of Ancient Medals," in *The Works of Joseph Addison*, ed. Henry G. Bohn, vol. 1, p. 203.

176 Edward Gibbon, "Extraits de Mon Journal," in *The Miscellaneous Works*, vol. 5, pp. 457-482.

177 Edward Gibbon, *Autobiography*, p. 142.

178 Edward Gibbon, "Extraits de Mon Journal," in *The Miscellaneous Works*, vol. 5, p. 482.

179 D. M. Low, ed., *Gibbon's Journal*, p. 34.

臺灣大學學術期刊資料庫

讚揚說「非常優秀」。吉朋坦承自己先前不瞭解羅馬曆法，對這篇論文愛不釋手，遂於「次日再讀一次，並對其徹底地思考一過」，有很大的收穫。[180]

吉朋很推崇法國古物學者巴特勒密的學術。巴特勒密是皇家銘刻與藝文學院院士，精通數種古代近東語言，是古泉幣文字研究的先驅。[181] 在 1763 年大旅遊旅次，吉朋在《皇家銘刻與藝文學院集刊》上讀到巴特勒密的〈論古代羅馬的紀念建築〉（"Memoir on the Ancient Monuments of Rome"），稱讚這篇文章「充滿鑑賞力、博學與好的識見，與這位敦厚的學者相配」。之前一年的復活節，吉朋在巴黎停留時，曾出席銘刻與藝文學院的一次公開聚會，就見識過巴特勒密的學養了。巴特勒密在會中作一場公開演講，講題是關於古埃及「科普特文」（Coptic）問題。吉朋驚訝地發現，巴特勒密居然有辦法把一個冷僻的學術課題講到連門外漢都能夠入耳，令他十分佩服：

> 巴特勒密在會中發表一篇討論古埃及科普特文的論文。這個演講有作預告，大家都怪他挑選這麼一個棘手的題目，說此種題目比較適合藝文學院內部的討論。但是，我們發覺巴特勒密藉其優美的文筆、細緻的考證、明晰又堅實的推理，把這個題目發揮到連社交圈人士與女性聽眾都感到津津有味。真令我們又驚又喜。[182]

相對地，他對英國古物學家史塔克利（William Stukeley, 1687-1765）的古史研究的可信度就有相當保留了。1757 年到 1759 年間，史塔克利寫了一部《皇帝卡勞西烏斯時期的紋章史》（*The Medallic History of Carausius*）。卡勞西烏斯（Marcus Carausius, d. 293）是高盧出身的羅馬將領，西元 283 年在高盧與不列顛地區自立為皇帝，後來遭到親信暗殺。吉朋對史塔克利這部書中一些論述不敢苟同：「由於卡勞西烏斯時代的

臺灣大學學術期刊資料庫

180 D. M. Low, ed., *Gibbon's Journal*, p. 33.

181 有關巴特勒密的生平與學術，參見 John E. Sandys, *A History of Classical Scholarship*, vol. 2, pp. 392-393.

182 Edward Gibbon, "Extraits de Mon Journal," in *The Miscellaneous Works*, vol. 5, pp. 444-445.

紋章仍然大量保存下來，這位皇帝遂成為考古的好奇心喜愛的主題，其生平與作為的各種景況都已研究得十分透徹。尤其，史塔克利博士為這位布列顛皇帝寫了一大本著作。我雖然使用他的一些資料，但拒絕其大部分的奇想臆測。」[183]吉朋對史塔克利學術信度的評斷，得到現代歷史家的認同。[184]

在吉朋眼中值得尊敬的古物學者並不多見，但他對法國學者提勒蒙與布里帖利的學識卻有很高的評價。提勒蒙是法國「博學派」的著名學者，編纂有《羅馬皇帝史》（*Histoire des Empereurs*）一書。這位學者治學的嚴謹令吉朋心悅誠服：「他那種難以企及的精確，幾乎到達天才之境。」[185]吉朋推崇《羅馬皇帝史》的史學價值：「要瞭解這部分奧古斯都時期歷史，研讀這部如此博學和準確的編纂，遠比閱讀那些既無方法、也不準確、又欠文采、更乏年序的原著為佳。我認為那些原著，還不如現存最差的修院編纂的年鑑。」[186]吉朋後來在寫《衰亡史》時經常引用這部書。[187]同樣地，吉朋讚揚布里帖利是「史學中之笛卡爾」。論及布里帖利有關奧古斯都時期政治建構的研究，吉朋評論道：

> 這位作者的思緒有種特殊的細緻感與親切的率直感。他擅於論辯，卻不流於枯燥，能以一種清晰、高雅的風格所含有的種種優雅來表達自己。誠然，這位史學中之笛卡爾推理或許有點太過先驗；他的結論較少建立在具體事實的權威上，而是建立在概括性的演繹上；不過，這是只有不凡天賦的人才會犯的毛病。[188]

183 Edward Gibbon, *The History of the Decline and Fall of the Roman Empire,* vol. 1, p. 358, n. 31.

184 20世紀史家大都認為，史塔克利有關卡勞西烏斯時期紋章的解讀大都純屬臆測。見 Stuart Piggott, *William Stukeley. An Eighteenth-Century Antiquary* (New York: Thames and Hudson Inc., 1985), pp. 139-141.

185 Edward Gibbon, *Autobiography*, p.172.

186 D. M. Low, ed., *Gibbon's Journal*, p. 163.

187 有關吉朋的運用提勒蒙的學術，參見 David P. Jordan, "LeNain de Tillemont: Gibbon's 'sure-footed mule'," *Church History* XXXIX (1970, New York), pp. 483-502.

188 Edward Gibbon, *An Essay on the Study of Literature*, p. 158. n.

臺灣大學學術期刊資料庫

布里帖利的《皇帝朱利安傳》（*The Life of Julian*），將「經常遭到誤解的奧古斯都體制，非常詳盡地呈現出來」。[189]吉朋承認自己就是透過這部書而首次認識了這位羅馬帝國統治者及其時代的歷史。[190]

義大利中古史家穆拉多利更是吉朋心目中古物研究學者的典範。穆拉多利是義大利摩德納（Moderna）公國的一個基層教士，曾經花費近 60 年的光陰在米蘭和摩德納圖書館收集資料，研究中世紀義大利歷史。[191]穆拉多利的學術路數也是屬於「博學派」傳統，編纂了大批義大利中古史史料、編年史，也寫過許多相關的專論。[192]吉朋坦承在《衰亡史》中處理中古史部分時，在很大的程度上是藉由穆拉多利的《義大利編年史》與《中世紀義大利古物研究》兩部大著的指引，始能順利進行書寫。[193]他推崇穆拉多利的博學與客觀，尊之為「我在義大利史方面的嚮導和師父」。[194]

（二）以古物證史

吉朋深深瞭解古物學可對歷史寫作發揮積極的功用。例如，他發現度量衡的研究有助於理解古代地理與經濟史：「各種度量衡的辨別是一

189 Edward Gibbon, *An Essay on the Study of Literature*, p. 158. n.

190 Edward Gibbon, *Autobiography*, p. 75.

191 有關穆拉多利的史學，參見 Denys Hay, *Annalists & Historians* (London: Methuen, 1977), pp. 165-167, 176-178.

192 穆拉多利編纂大量有關中古義大利的史籍，包括：(1) *Rerum Italicarum Scriptores*, 25 vols. (Milan, 1723-1751); (2) *Antiquitates Italicae medii Aevi*, 6 vols. (Milan, 1738-1743); (3) *Dissertazioni sopra le Antichità Italiane*, 3 vols. (Milan, 1751); (4) *Annali d'Italia*, 18 vols. (Milan, 1753-1756); (5) *Delle Antichità Estensi ed Italiane,* 2 vols. (Moderna, 1717, 1740). 吉朋在《衰亡史》最後第二章的最後一個註釋詳細介紹穆拉多利的史學，見 Edward Gibbon, *The History of the Decline and Fall of the Roman Empire*, vol. 7, pp. 299-300, n. 110.

193 Edward Gibbon, *Autobiography*, p. 172.

194 Edward Gibbon, *The History of the Decline and Fall of the Roman Empire*, vol. 7, p. 300, n. 110.

臺灣大學學術期刊資料庫

種新的語言，……可作為一個通譯，協助我們理解古代地理、商業、經濟等課題。」[195]過去遺留的「殘蹟」甚至可以重建某些古代史事的真相。《衰亡史》卷 1 述及「五賢帝」之一的哈德良（Hadrian, 117-138 在位）的穩健與勤政，讚揚「哈德良孜孜不倦的工作……令人印象深刻」。正文中，吉朋採用 3 世紀史家迪歐《羅馬史》（*Historia Romana*）的敘述來說明哈德良的事功：

> 哈德良的一生是永不停息的視導行程，集軍人、政要、學者的才能於一身，從帝王職責的踐行中滿足自己的求知慾，根本不在意季節和天候的狀況，光著頭徒步在冰天雪地的卡里多尼亞行軍，或是跋涉在上埃及的炙熱平原。他的足跡踏遍了整個帝國，所有行省都親臨巡幸。[196]

從西元 121 年起，哈德良風塵僕僕地巡行帝國，從不列顛、茅里塔尼亞（Mauretania）、近東地區、希臘、義大利到埃及各地。這位皇帝在巡行所到之處，都頒行紀念章或勒石立碑以資紀念，因而留下許多珍貴史料，足供後世史家瞭解其事蹟。「即便我們的古代歷史家全都消失了」，吉朋相信，「紋章、銘刻與其他的紀念物，也足以記錄皇帝哈德良的巡行實錄」。[197]

在閱讀《衰亡史》的正文，或檢視註釋時，細心的讀者常可遇到這類的資訊。首先，吉朋經常利用古泉幣來證史。[198]例如，羅馬泉幣上的圖像資料可證明皇帝庇烏斯（Antonnius Pius, 138-161 在位）確實廓然無私。西元 98 年到 180 年，羅馬帝國政治穩定，社會經濟繁榮，享受太平盛世歲月。這段太平盛世，一般認為與此時羅馬帝位繼承的平順有密切關係。從納爾瓦（Marcus Nerva, 96-98 在位）到奧里略（Marcus Aurelius,

195 Edward Gibbon, *The Miscellaneous Works*, vol. 5, p. 66.

196 Edward Gibbon, *The History of the Decline and Fall of the Roman Empire*, vol. 1, p. 8.

197 Edward Gibbon, *The History of the Decline and Fall of the Roman Empire*, vol. 1, p. 8, n. 27.

198 根據 David P. Jordan 的統計，吉朋在書中引用泉幣資料作證據多達 30 處。見 David P. Jordan, *Edward Gibbon and His Roman Empire*, p. 61.

臺灣大學學術期刊資料庫

161-180 在位）期間，羅馬皇帝都是從元老院中挑選一位才德兼備的元老，認作「養子」，並授以權力，培養聲望，在臨終前傳位予他。此一措施避免武力爭奪，使帝國內部穩定。這些皇帝之所以採取「養子」作法，傳統上認為是因這幾任皇帝恰巧都沒有子嗣而不得不然。不過，吉朋卻從泉幣的資料發現，庇烏斯傳位給奧里略其實並非因本人絕嗣，而純然出自大公無私：

> 兩位安東尼皇帝才德兼備，統治羅馬世界長達四十二年之久。雖然庇烏斯有兩個兒子，卻能以國事為念，不顧家庭私利，將女兒弗斯汀娜（Faustina）嫁給年輕的馬可斯，並幫他從元老院獲得執政官和護民官的權力，毫無自滿、猜疑的心理，真誠邀請馬可斯共同處理國政。[199]

吉朋何以知道庇烏斯並非絕嗣？他考察庇烏斯在位期間發行的泉幣，發現這位皇帝其實育有兩個兒子，名字都出現在當時發行的泉幣上。他讚嘆道：「若非紋章與銘刻之助，我們還不知道有此事。庇烏斯真是受人尊敬、值得懷念！」[200]這一資料證明庇烏斯傳位給奧里略完全是「以國事為念」，而非因自己恰好沒有兒子可以繼承帝位。這一事實更能凸顯庇烏斯個人的賢明。

根據泉幣的圖文，吉朋發現，在西元 8 世紀時羅馬城的居民習慣把羅馬教宗奉作是一個「世俗君王」。《衰亡史》卷 5 描寫中古教宗的世俗權威說：「他的賑濟、他的講道詞、他與西方國王與上層教卿的通信、他新近的禮拜式、他們的謝恩與口誓等，在在都使羅馬人習於視之為這城市的首宰或君王。」實際上，羅馬人甚至直接稱呼教宗為「君上」，而這可從泉幣上的文字與圖像看出來。吉朋寫道：

> 教宗的基督教謙卑，並未因「君上」（Dominus）或「主上」（Lord）之稱號而感覺受到冒犯。在最古老的泉幣面上，他們的容貌和銘文仍

199 Edward Gibbon, *The History of the Decline and Fall of the Roman Empire*, vol. 1, p. 76.

200 Edward Gibbon, *The History of the Decline and Fall of the Roman Empire,* vol. 1, p. 76, n. 50.

臺灣大學學術期刊資料庫

然明顯可見。他們的俗世統治，如今因千年的尊崇而獲得確定了。[201]

吉朋嘲諷說，教宗對此一世俗尊稱似乎沒有拒絕，反而視為當然。同樣地，泉幣資料也可證明羅馬皇帝有將自己神格化的現象。奧瑞連皇帝發行的泉幣上，同時鐫有 “Deus”（神）與 “Dominus”（君）的字樣，顯露出這位統治者的獨裁，「不耐民政機構的約束」。[202]

吉朋也以泉幣資料來澄清諸多羅馬帝國史事的爭議。史載皇帝朱利安（Julian the Apostate, 360-363 在位）曾嘲笑其叔皇帝君士坦丁（Constantine, 306-337 在位）的裝扮，說他著東方式龍袍，全身絲錦綢緞，珠光寶氣，脂粉味太重。歷來史家對朱利安的批評是否屬實或無的放矢，頗有爭議。吉朋卻在古物學者史班漢收集的泉幣資料上，看到皇帝君士坦丁確實有此裝扮：「朱利安……意圖嘲弄其叔父。他的證言雖遭質疑，然博學的史班漢卻據泉幣之權威予以證實。」[203]泉幣資料還可以協助訂正其他史事。根據紋章專家史班漢出版的泉幣資料，吉朋發現共和時期羅馬公民投票時，是一次一個通過一座窄橋，然後投下神聖的一票；[204]皇帝卡拉喀拉（Caracalla, 211-217 在位）崇拜亞歷山大大帝（Alexander the Great），甚至以之自況，在臂章刻上亞歷山大的名字與圖像；[205]馬克西米努斯（Maximinus, 235-238 在位）皇帝的皇后名為葆麗娜（Paullina），且從其有「女神」（Diva）稱號可以推知，她比馬克西米努斯早逝世。[206]吉朋還引證哥德王狄奧多瑞（Theodoric, 471-526 在位）發行的泉幣上的「宮殿圖案」，說明什麼是「最古老而且最真實

201 Edward Gibbon, *The History of the Decline and Fall of the Roman Empire*, vol. 5, p. 264, n. 46.

202 Edward Gibbon, *The History of the Decline and Fall of the Roman Empire*, vol. 1, p. 315, n. 101.

203 Edward Gibbon, *The History of the Decline and Fall of the Roman Empire*, vol. 2, p. 205, n. 6.

204 Edward Gibbon, *The History of the Decline and Fall of the Roman Empire*, vol. 4, pp. 447-448, n. 28.

205 Edward Gibbon, *The History of the Decline and Fall of the Roman Empire*, vol. 1, p. 138, n. 46.

206 Edward Gibbon, *The History of the Decline and Fall of the Roman Empire*, vol. 1, p.173 n. 12.

臺灣大學學術期刊資料庫

的哥德式建築模型」。[207]

其次，吉朋利用「銘刻」資料來說明羅馬帝國的社會與文化狀況。例如，他以銘刻資料來佐證帝國西部地區拉丁教化政策的成功。《衰亡史》第 2 章寫道：

> 帝國在征服西部領域的同時，也施以教化，未開化的蠻族很快就安於降服，知識和禮儀帶來新的印象，開啟他們的心智。味吉爾和西塞羅所使用的語言，雖無可避免地混雜著以訛傳訛的謬誤，還是廣泛地被阿非利加、西班牙、高盧、不列顛和潘農尼亞（Pannonia）的民眾所採用。[208]

吾人如何知道拉丁文化廣被帝國西部？吉朋指出兩種證據。一方面，帝國西部各省文人輩出，阿非利加有阿普列烏斯（Lucius Apuleius Madaurensis, c. 125-c. 180，文學家）和奧古斯丁（Augustine of Hippo, 354-430，神學家），西班牙和高盧地區出現史特拉波（Strabo, 地理學家），不列顛有塔西陀（歷史家），潘農尼亞則有維列烏斯（歷史家）。這些拉丁作家能在上述地區出現，足以說明其拉丁文化的深厚。另一方面，這個時期該區的銘刻皆以拉丁文寫成，間接證明了拉丁文的普及：「這些人之外」，吉朋說道，「我們還可加上當地銘刻所用的語言」。[209]

同一章裡，吉朋指出帝制時期羅馬人善待奴隸，甚至鼓勵他們婚配、組織家庭。他解釋羅馬善待奴隸的原因說：

> 當歐洲、亞洲和非洲的主要國家，都統合在一個主權國家的法律體系之下，從外國獲得奴隸的來源日益稀少，羅馬人只有用溫和的手段和冗長的方式，就是用繁殖來維持需要。很多家庭鼓勵奴隸婚配生子，特別是有田產的大戶更是如此。情感的作用、教育的陶冶及

207 Edward Gibbon, *The History of the Decline and Fall of the Roman Empire*, vol. 4, pp. 191-192.

208 Edward Gibbon, *The History of the Decline and Fall of the Roman Empire*, vol. 1, p. 37.

209 Edward Gibbon, *The History of the Decline and Fall of the Roman Empire*, vol. 1, p. 37, n. 40.

臺灣大學學術期刊資料庫

財富的獲得，都可減輕奴役的痛苦。[210]

根據吉朋的考察，帝制時期羅馬奴隸的待遇比共和時期好得多。這個論斷有何具體根據？吉朋在荷蘭學者葛路特編的《古代銘刻全集》（*Corpus inscriptionum antiquarum*, 1602）中，找到「大量銘刻，幾乎最可能是出自帝制時期，係由奴隸具名，以紀念其妻兒、朋友和主人」。[211]奴隸能夠具名寫紀念文字，甚至流傳下來，說明他們有機會受教育，文化層次不低。這間接證明了帝國時期的奴隸所受之待遇應不差。

總之，在寫作《衰亡史》的過程中，吉朋多方運用了古物學派所發掘、考證過的實物史料，如「銘刻」、「泉幣」與「遺跡」等，來補充文字資料的不足，或旁證文字資料無法呈現的歷史情境。這些古文物史料的運用，豐富了吉朋羅馬史書寫的資料基礎與敘事內涵。

五、結語

這篇論文探討的是吉朋羅馬史寫作的近世歐洲古典學術背景。近世歐洲古典學術起源於文藝復興人文學者對古代典籍的發掘與考訂。從 16 世紀到 18 世紀，歐洲古典學術的興趣從回復「古典價值」轉向再現「羅馬文明」的整體，研究對象也從單純的「文本考訂」擴及「古代文物」的考掘。歷經數個世代的努力，歐洲古典學界發掘了無數古史知識，保存在學者出版的專著或發表在古典學術期刊裡。這些研究與發掘使古典歷史的輪廓越來越清晰，只是傳統歐洲史家宥於學術成見，對這些研究成果視而不見，不曾思考它們對歷史書寫可能產生的積極用處。

文藝復興的精神是「崇古」，奉「古典」為完美的典範。受到這種精神的影響，人文主義的史家養成一種心態，認為古羅馬史已經由塔西

臺灣大學學術期刊資料庫

210 Edward Gibbon, *The History of the Decline and Fall of the Roman Empire*, vol. 1, pp. 39-40.

211 Edward Gibbon, *The History of the Decline and Fall of the Roman Empire*, vol. 1, p. 40, n. 51.

陀、李維、蘇東尼烏斯等古代名家書寫完備，後代史家沒有理由重新寫過，即便重寫也無法超越他們的成就。[212]到 17 世紀，這種態度仍然根深蒂固。培根就宣稱：

> 我不期望能給希臘一部從帖西烏斯（Theseus）到菲羅波伊門（Philopoemen）時期的完整歷史；……或給羅馬一部從羅慕拉斯（Romulus）到查士丁尼（Justinian）時期的完整歷史。……在這一歷史系列中，前者有修昔底德與贊諾芬，後者有李維、波力比烏斯、沙魯斯特、凱撒、阿比安（Appianus）、塔西陀與希羅迪安那斯（Herodianus）等。這些都應全部保留下來，毋庸任何修減，只須增添或續加。[213]

在他看來，「希臘與羅馬」乃是上帝神定的兩個「典範國家」，其既有的歷史寫作「已臻於完整境地」。現代史家無法重回古代的時空去見證歷史，不可能寫出比古代史著更接近真實的歷史，至多只能予以增補或續加。由是，近代早期歐洲的歷史家很少嘗試「古代」的「完美歷史」的寫作。比如說，文藝復興人文學者馬基維利（Nicolo Machiavelli, 1469-1527）可以書寫「現代史」的《佛羅倫斯史》（*istoria firenze*），但是他的「古代史」研究卻是以評論古典史家李維《羅馬史》（*Discorsi sopra la prima deca di Tito Livio*）的形式來呈現。

但是，這並不意味近代早期的學者忽視古代史的探索。事實恰好相反，只是他們在古代史研究方面另闢蹊徑，投入的是「古典考訂」和「古物研究」領域。在這個過程中，他們發現、累積了諸多古代歷史的新證據，而無意中為一種新的歷史方法鋪路。誠如義大利著名史家摩米格里亞諾（Arnaldo Momigliano, 1908-1987）所說：「有了多少具永恆價值的、關於紋章、古文書、銘文與圖像的論著，18 世紀的古物學家遂可以懷著其前輩所沒有的信心，大膽地進入舊的或新的領域。他自己可以讓自己

臺灣史與臺灣學術 期刊資料庫

212 Arnaldo Momigliano, “Ancient History and the Antiquarian,” in *Studies in Historiography*, p. 6.

213 Francis Bacon, *The Advancement of Learning*, p. 75.

轉變成歷史家，或者可以協助歷史家書寫一種新型的歷史。」[214]這就是吉朋這一代史家面臨的新史學環境。

吉朋自幼接受古典教育，在長期的問學過程中逐步深入古典學術領域。他生長在啟蒙運動的時代，是時歐洲知識活動的主流已轉向近代科學，文藝復興以來蓬勃發展的古典學術逐漸沒落。吉朋本人並沒有成為一個皓首窮經的古典考證或古物研究專家，但是他在這方面的興趣與接觸卻足夠讓他認識兩種學術的價值與用處：「這個時代才剛受啟蒙到足以認知他們的研究的用處，但是既不夠敏銳、又尚未提昇到能夠理解，藉著哲學之光可以從其中收割到什麼好處。」[215]吉朋本人真正的志業在歷史，卻是少數瞭解、懂得運用古典研究於歷史書寫的歷史家，而《衰亡史》即是這一種運用的傑出表現。這就是吉朋《衰亡史》寫作的歐洲古典學術脈絡，近代古典學術的發展意外地創造了適當的學術條件，讓吉朋得以實現其「羅馬帝國歷史家」的願望。

*這篇論文的研究，起始於 2004 年的國科會專題研究計畫：「吉朋與《羅馬帝國衰亡史》」（計畫編號 93-2411-H-002-037），承蒙國科會的資助，謹此致謝。同時，作者也要感謝兩位匿名審查人提供寶貴的修訂意見，與臺大歷史學報編輯同仁的細心校閱，使本文減少不少錯誤，全文更完善。

（責任編輯：林楓珏　校對：石昇烜　蔡佩玲）

臺灣大學學術期刊資料庫

214 Arnaldo Momigliano, “Ancient History and the Antiquarian,” in *Studies in Historiography*, p. 18.

215 Edward Gibbon, *An Essay on the Study of Literature*, p. 9.

引用書目

一、史料文獻

Addison, Joseph. “Dialogues upon the Usefulness of Ancient Medals.” In *The Works of Joseph Addison*. Edited by Henry G. Bohn. London: George Bell & Sons, 1906.

Bacon, Francis. *The Advancement of Learning*. London: J. M. Dent & Sons, 1962.

Beaufort, Louis de. *Dissertation sur l’Incertitude des cinq premiers Siecles de l’Histoire Romaine*. Utrecht, 1738-1750.

Gibbon, Edward. *An Essay on the Study of Literature*. London: T. Becket and P. A. De Hondt, 1764.

Gibbon, Edward. *The Miscellaneous Works of Edward Gibbon, Esq*. London, 1814.

Gibbon, Edward. *The History of the Decline and Fall of the Roman Empire*. London: Methuen & CO., 1905.

Gibbon, Edward. *Autobiography of Edward Gibbon as Originally Edited by Lord Sheffield.* Oxford: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1907.

Howatson, M. C., & Ian Chilvers, eds. *Oxford Concise Companion to Classical Literature*. Oxford: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1993.

Livy, *History of Rome.* London: J. M. Dent & Sons, 1926.

Low, D. M., ed. *Gibbon’s Journal To January 28th, 1963*. New York: W. W. Norton & Company, 1929.

Paton, W. R., trans. *Polybius: The Histories.* Loeb Classical Library; Chicago: University of Chicago Press, 2012.

Polybius, *Historiarium libri qui supersunt. J. Gronovius emendavit*. Gr. And Lat. Amsterdam, 1670.

Voltaire. “Men of Letters.” In Diderot & D’Alembert, *Encyclopedia: Selections.* Translated with an Introduction and Notes by Nelly S. Hoyt & Thomas Cassirer. Indianapolis: Bobbs-Merrill Company, Inc., 1965.

Vopiscus, Flavius. “Aurelianus.” In *Historia Augusta.* Edited by David Magie. Loeb Classical Library; London & Harvard, 1932.

二、近人研究

王任光，《文藝復興時代的人文運動》。臺北：臺灣商務印書館，1968。

傅偉勳，《西洋哲學史》。臺北：三民書局，1987。

楊肅献，〈青年吉朋：一位羅馬帝國歷史家的養成〉，《新史學》第 12 卷第 2 期，2001，

臺灣大學學術期刊資料庫

臺北，頁 41-130。

Brown, Harcourt. “History and the Learned Journal.” *Journal of the History of Ideas* 33, no. 3, 1972, Philadelphia, pp. 365-378.

Davis, Robin. *The Grammar School.* Harmondsworth, Middlesex: Penguin Books Ltd., 1967.

d’Alembert, Jean Le Rond. *Preliminary Discourse to the Encyclopedia of Diderot*. Translated by Richard N. Schwab. Chicago: University of Chicago Press, 1995.

Franklin, Julian H. *Jean Bodin and the Sixteenth-Century Revolution in the Methodology of Law and History.* New York: Columbia University Press, 1963.

Garrod, H. W. *Scholarship: Its Meaning and Value.* Cambridge: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1946.

Hay, Denys. *Annalists & Historians*. London: Methuen, 1977.

Jones, Richard F. *Ancients and Moderns: A Study of the Rise of the Scientific Movement in Seventeenth-Century England*. Gloucester, Mass.: Peter Smith, 1961, 1975.

Jordan, David P. “LeNain de Tillemont: Gibbon’s ‘sure-footed mule’.” *Church History* XXXIX, 1970, New York, pp. 483-502.

Jordan, David P. *Edward Gibbon and His Roman Empire*. Urbana: University of Illinois Press, 1971.

Keynes, Geoffrey. *The Library of Edward Gibbon.* Second Edition. Dorchester, 1980.

Levine, Joseph M. *The Battle of the Books: History and Literature in the Augustan Age*. Ithaca: Cornell University Press, 1991.

Machin, I. “Gibbon’s Debt to Contemporary Scholarship.” *Review of English Studies* 15, 1939, Reading.

Maland, David. *Culture and Society in Seventeenth-Century France.* London: B. T. Batsford Ltd., 1970.

Miller, Peter N. *Peiresc’s Europe: Learning and Virtue in the Seventeenth Century*. New Haven: Yale University Press, 2000.

Mingay, G. E. *English Landed Society in the Eighteenth Century.* London: George Allen & Unwin, 1956.

Momigliano, Arnaldo. “Ancient History and the Antiquarian.” In *Studies in Historiography*. London: Weidenfeld and Nicolson, 1966.

Momigliano, Arnaldo. *The Classical Foundations of Modern Historiography*. Berkeley, CA: University of California Press, 1990.

Nauret, Charles G., Jr. *Humanism and the Culture of Renaissance Europe.* Cambridge: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1995.

Norton, Jane E., ed. *The Letters of Edward Gibbon*. London: Cassell and Company Ltd., 1956.

Parry, Graham. *The Trophies of Time: English Antiquarians of the Seventeenth Century*. Oxford: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1995.

臺灣大學學術期刊資料庫

Pfeiffer, Rudolf. *History of Classical Scholarship from1300 to 1850*. Oxford: Clarendon Press, 1976.

Piggott, Stuart. *William Stukeley. An Eighteenth-Century Antiquary*. New York: Thames and Hudson Inc., 1985.

Popkin, Richard H. *The History of Scepticism: From Savonarola to Bayle*. Oxford: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2003.

Sandys, John E. *A History of Classical Scholarship*. New York: Hafner Publishing Co., 1964.

Shackleton, Robert. "The Impact of French Literature on Gibbon." *Daedalus*, Summer, 1976.

Weiss, Roberto. *The Renaissance Discovery of Classical Antiquity*, 2nd ed. Oxford: Basil Blackwell, 1988.

White, Jeffrey A. "Introduction" to Flavio Biondo, *Italy Illustrated.* Vol. 1, Books 1-4. Edited and translated by Jeffrey A. White. Cambridge, MA: Harvard University Press, 2005.

Wilamowitz-Moellendorff, U. von. *History of Classical Scholarship*. Translated with an Introduction and Notes by Hugh Lloyd-Jones. London: Gerald Duckworth & Co., 1982.

臺灣大學學術期刊資料庫

Historical Inquiry 51 (June 2013), pp.119-180
Department of History, National Taiwan University
DOI: 10.6253/ntuhistory.2013.51.03

Edward Gibbon's Historiography and the Classical Scholarship of Modern Europe

Yang, Su-hsien*

Abstract

This article investigates the connection between Edward Gibbon's account of the Roman Empire and the classical scholarship of early modern Europe. Gibbon devoted most of his scholarly life to writing *The History of the Decline and Fall of the Roman Empire*. It took him nearly twenty years to complete this masterwork. On what scholarly foundation was this masterwork based? This is an important question which deserves further inquiry. Gibbon came from a gentry family and had received a classical basic education from grammar school through his youth. He was later sent to Lausanne, Switzerland, to receive a Protestant education and it was on this venture that he was introduced into the world of French classical scholarship. He then read extensively the writings of European scholars from the Renaissance, covering classical philology and antiquarian research. In this way, he accumulated a large amount of historical knowledge on Roman history, laying the foundation for his later work on the Roman Empire. Gibbon himself never became a professional classical scholar, but he understood very well the value of the researches of classical scholars, and knew how to make use of their findings to illuminate ancient history. In writing *The History*, he shrewdly combined the classical scholarship of modern Europe and the spirit of the Enlightenment, thus giving the world the greatest historical writing since classical times.

Keywords: Edward Gibbon, Roman Empire, classical scholarship, antiquarianism

臺灣大學學術期刊資料庫

* Professor, Department of History, National Taiwan University.
No. 1, Sec. 4, Roosevelt Road, Taipei 10617, Taiwan; E-mail: yangsh@ntu.edu.tw.